

慎的。对外条约有的要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

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向受着外国侵略者的压迫。多少先烈为了民族的解放流血牺牲，但这种压迫一直未能除去。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扬眉吐气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失败了，美国帝国主义也正在失败。美帝国主义固然还是强大的，但他是外强中干的。我们与美帝也交过手，文仗武仗都打过。文仗和马歇尔打了一年，最后他还是失败而去。帝国主义就是纸老虎，你硬一点，他就软些，你软一点，他就骑到你的头上。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们是不让的，决不让。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采取严肃的态度，使他了解中国是不可欺侮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就是为此而奋斗了一百多年！我们要自力更生，然后才能争取外援。外援如有利于中国，当然要，但不能依赖。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如果只依赖外援，那还能办什么事？蒋介石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依赖外援，这是“前车之鉴”。我们愿意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我们不排除，不挑衅，但必须站稳立场，否则就只能倒在外国人的怀里。中国共产党就是带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伟大气概开始的。虽然当时只有五十多个人，其中李大钊同志英勇壮烈，血洒北平。但任何新生事物在开始时都不过是一枝幼苗，一切新生事物之可贵，就因为在这新生的幼苗中，有无限的活力在成长，成长为巨人，成长为力量。这是自然的规律。一切腐朽的东西，尽管是一大堆，但必然一天一天死亡，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站稳了立场，又要很谨慎，有理有利有

节地去处理问题。这和五四时代的反封建有相同之处，那时反对封建很坚决，提出打倒孔夫子、对封建家庭斗争的口号。但今天看来，孔夫子的话若是好的，我们也可引用。我们的父母来了，也还得照顾照顾。对封建要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同时采取分析态度，对帝国主义也要如此。

在军事上，美国军队驻在中国无论如何总是缺理的。我们叫他们退出去，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呼声。他们国家的事我们管不了，但在中国的领土上，美军若不退出，我们就有权消灭他们。美国若是大规模出兵，我们也不怕。中国是吓不倒的。中国是古老的民族，也是勇敢的民族。中华民族有两大优点：勇敢，勤劳。这样的民族多么可爱，我们爱我们的民族（当然其他民族也有他们可爱之处，我们决不忽视这一点），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泉源。美军若真敢侵略到中国来，占领我们的大城市，我们就用乡村包围城市，叫他们什么军需品（包括大便纸和冰淇淋）都必须从美国运来，还要背上大城市这样的包袱，负责供养。美国人生活程度高，他们是不愿打仗的。俄国十月革命后，美国也闹过出兵干涉，结果还不是“自动撤退”？就因为吃不了苦。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军，难道还怕美国兵？

在政治上，我们的立场仍然是民族独立，平等相待。美国国会在吵嚷承认不承认中国。其实，这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你承认我，我承认不承认你还尚待考虑。不过我们不挑衅。我们虽未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但对侨民还是保护的。美国驻天津总领事以总领事的资格递来一封信，我们就退回去，说没有外交关系，恕不来往。后来他用铁路职员的名义写信来，我们就让他登记。其实，美国也不是不要和中国往来，司徒雷登一直到处找我们拉关系。傅泾波在香港老是给我和邓颖超及其他的人写信。美国人是两面做法，想用各种办法来试探，要看看中

共动向如何。中共的动向是容易明白的，只要听一次报告或看几个文告就知道了。至于将来和平实现后的情形，我们会实事求是地处理，反正各国大使馆在那里，我们既不断绝，也不急于建立外交关系。如果急于要求承认，就会陷于被动。帝国主义若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我们在政治上不排外，在军事上不挑衅，有理有利有节，我们又何惧之有呢？

在经济上，有买卖就做，国际贸易要开展，这是于双方都有利的。帝国主义的特权，我们不承认，但此中问题很复杂，不能遽然解决。

在文化上，帝国主义有许多侵略机构，如学校、医院及教堂等，这些都应该由中国人来办，但不能急躁，要谨慎地一步步地来。这些文化机构有坏的一面，但还有好的一面，例如协和医院，我们的人生了病还去那里就医。对于这些机构，我们可以从内部来改造，使它们变成民族的。

关于第八条，再补充一点。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我们允许南京政府还存在一个时期。起先我们想用革命军事委员会来指挥它，南京代表团觉得不好，我们取消了这个主张，而使二者平列。若南京政府签订了和平协定，并且履行了，则我们保证负责向政协筹备会提出让他们参加新政协。当然，通得过与否，那是另一问题。

这八条二十四款，南京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我们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在二十日以前答复，如不接受，则二十日我们一定打过江去。再不过江，连南京代表团都说，江南人民实在受不住了。所以不能再延了，再延就太对不起那里的人民了。当然，打过江后，如果他们又愿意签字也可以。总之，门是开着的。南京代表团以为我们老是要和平，一定有弱点。第一，他

们见我们快要当家了，以为我们很怕破坏，老鼠蹲在花瓶上，投鼠要忌器。第二，面对滔滔长江，他们以为我们一定很怕牺牲。所以，他们老是讲价钱。其实，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和平也不免有破坏，战争也不见得就把一切都打碎，总有打不碎的，或者我们去得快些，他们来不及破坏。我们不过是争取愈少破坏愈好罢了。所以，这是吓不了人的。我们明白告诉他们：战，他们就要完蛋，和，他们还可以有出路，当然不是什么南北朝，而是改造。

各位朋友，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是四个阶级合作的。即使是地主，在劳动几年之后，也可以变为农民。过去因为环境不同，我们不在一起，今天既然到了统一的环境，就可以大家一起来干。非共产党人也照样能工作，甚至做得更好。共产党人不是天生的。我的先代是“绍兴师爷”，什么“少有大志”，那是鬼话。

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一定要实现，不论用战斗或是用和平的方法。用和平方法比战斗还要忙，要大家帮助。希望在小组讨论或座谈会中提出意见。我们长期在农村，对城市已经很生疏了，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 朱 德

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经过双方代表团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表示了对于战犯问题的宽大处理，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和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人员的宽大处理，对于其他各项问题亦无不是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作了适宜的解决。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一月一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因为，既然承认惩办

* 这个命令是毛泽东起草的。

战争罪犯，用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国民党反动军队，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以及其他各项基础条件，就没有理由拒绝根据这些基础条件所拟定的而且是极为宽大的各项具体办法。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 德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毛 泽 东

〔新华社北平二十四日六时电〕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李宗仁、何应钦及南京的国民党军队于昨日上午逃出南京。李、何等乘飞机逃往上海。国民党南京守卫部队及宪兵，沿京杭公路逃跑。浦口的国民党军，于二十二日撤至南京，二十三日一同往京杭路上奔逃。芜湖及镇江一带的国民党军，亦向同一方向乱窜。人民解放军正向南京急进，如果昨夜没有入城，则可能于今日入城。南京人民正在等候着人民解放军。在国民党军已离开南京，人民解放军尚未入城的时间，南京人民已于昨日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并于昨日下午六时发电致毛泽东主席，欢迎人民解放军。该电称，毛主席勋鉴：南京守军于二十三日撤退。南京人民为安全计，联合发起各界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推青苑为主任委员，贻芳为副主任委员，及委员十三人。地方尚称安定。恳请电飭京陵外围野战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以慰民望。何日入城，并请电示，以便欢迎。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主任委员马青苑，副主任委员吴贻芳及委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消息。

员等同叩梗酉。

根据新华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刊印。

在天津市干部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刘 少 奇

我来到天津，听一些同志谈了谈天津的情况，还没有谈完，也到有的地方看了一下。总起来讲，你们对天津了解的比我多一些，不过，并不是很够了，依我看还是不够，还须继续了解。

天津有很多困难问题。同志们向我提出：这些问题怎么办？我的办法也很少，还是大家想一想，看有什么办法。

我今天不能提出肯定的意见。今天谈的话，只当作一种引言，好像作文章的引言一样，把大家的意见引出，叫大家注意一些问题，以便最后解决。我今天讲话的性质先确定是引言性的。

天津接收工作已好几个月了，早已结束了。同志们很辛苦，一般都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作风。毛病虽有，但不很多。中央对同志们的接收工作是满意的。接收工作早就过去了，今后的问题是如何管理好天津。所谓管好，就是要把天津可能与必须改造的加以改造，并加以发展。管理、改造、发展天津，把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变为新的、生产的、人民的天津。

* 这是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天津进步了，管好了，改造好了，以后就更容易管了。现在接收好了，但没有管好，还没有加以改造。至于发展还是将来的任务。

管好天津、改造天津用什么办法呢？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有决议，就是必须诚心诚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注意是“劳动群众”，如手工业劳动群众等，而不是“贫民”），争取知识分子（注意“依靠”、“团结”、“争取”，这些文字要看清楚），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注意是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并且尽可能多的那些民族资本家，“自由”是加了形容了，“争取”呢？就是要多多地争取可能和我们合作的这些人），站在我们方面，不是站在帝国主义方面，不是站在国民党方面，不是站在官僚资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守中立，不跑到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方面去。

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干什么？就是要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以便一步步地战胜敌人；同时开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

这是一切城市工作的，也是管好天津市工作的总路线。

我们办党要编队伍，进行革命也要编队伍。革命队伍是什么人组成的？就是依靠工人，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自由资产阶级分子。我们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我们三个敌人，四个朋友。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这是敌人阵线，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则是我们的

阵线。

我们是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发展生产事业，也是在扩大我们的队伍，即在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的基础上来发展生产事业。天津工作的任务是管理、改造、发展天津。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执行二中全会确定的路线。如果我们在上面说的两点上发生了模糊，发生了动摇，发生了错误，就是对总路线的模糊、动摇、错误。

在这里，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不但不是斗争对象，而且是争取对象。所以今天天津市的资本家，不但不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斗争对象，相反是团结争取对象。如果把资本家当作斗争对象，就是犯错误，因为这跟二中全会的路线不符合，跟党的总路线不符合。把资本家当作敌人，就扰乱了自己的阵线。

至于小资产阶级，小资本家，就更加不是斗争对象，如果当成斗争对象，也是犯错误，同样把我们的阵线搞乱了。这错误是路线错误，不是什么小错误。

那么对于资本家、自由资产阶级是否要进行斗争？共产党、工人、其他劳动人民对于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没有斗争的，特别是过去资本家压迫工人，剥削工人，工人是恨他们的。解放后，工人要求斗争他们出出气，这是很可以理解的。这些斗争，适当进行一些也好。自由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跟我们是矛盾的，在政治思想上跟我们是否有矛盾有斗争呢？也是有的。在适当时候，在可能的情形下，与自由资产阶级进行适当的斗争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党对资本家是又联合又斗争，不是只斗争不联合，也不是只联合不斗争，只联合不斗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只斗争不联合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那么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还是斗争呢？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自由资产阶级，而不要把重点放在斗争上。今天把重点放在联合上，将来重点是否会变更呢？那也是可能的。重点是联合，还联合多少年呢？不是短时期的，而是相当长期的。在中国的条件下，有些资本家将来还可以同我们一起走入社会主义。前几天我和东亚毛织厂经理宋棐卿先生说，再过多少年，你办了八个厂，而大势所趋走入了社会主义，那时跟你商量，再给你八个厂，共十六个厂交你办，你能管理工厂，薪水给你增加，你干不干？他说，要能那样，哪有不干的！

所以，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是又斗争又联合，今天的重点是联合，但不是无原则的联合。在什么地方联合？我想主要是在经济上联合，资本家替国家制造东西，我们帮助他，共同买原料，共同推销。工人同资本家在劳资问题上总会有很多斗争的，在政治上，特别是在思想上、理论上会有更多的争论。所以，在哪些方面跟他有更多的合作，哪些方面合作的可能性少些。要弄清楚。

有些同志不知不觉地把天津资本家当作主要斗争对象了！如果这点不指出来，就会使他们犯错误。敌人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这问题也有加以解释的必要。天津解放后，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找不到了，看不到了，于是就把子弹打在资本家头上，把朋友当敌人，这就打错了，同时又有的把敌人放过了。该打的不打，不该打的打了，犯错误了。

帝国主义还没倒，还有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国民党还存在。拿枪的敌人没有了，不拿枪的敌人还有，我们要善于同不拿枪的敌人作战。你们解放天津，一次战役三十一小时，就把拿枪的敌人打败了，但不拿枪的敌人则三十一天，甚至三十一

年也不一定能消灭完。

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站在我们方面，要一贯起来。天津人口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要团结起来，敌人很少。组织这样大的队伍跟敌人斗争，基本目标就是为了把生产发展起来，在党的总路线下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应如何做呢？毛泽东主席要我们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都照顾到，以实现发展生产的目标。

什么是照顾四面八方呢？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公私兼顾”中的公、私有两种意义，一是工人对厂主、雇主，一是个人利益对国家人民利益、党的利益。最近，毛主席同上海商业界代表谈话，他们问：“共产党的经济方针是什么？”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是“唯利是图”。这些人听了觉得很合胃口，说：“共产党也唯利是图？”毛主席说：是的，不过有点区别，我们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图，而不是唯个人的利益是图。

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是毛主席要我们在城市工作中照顾的四面八方的关系，这四面八方都照顾好了，关系正确地建立了，改善了，城市工作就做好了。四面八方的关系就是全面关系。照顾到四面八方就是照顾到全面，所以也叫做全面关系，如果哪一方哪一面照顾不到，就犯严重错误，就不能在党的总路线下实现发展生产的目标。

毛主席在与上海商人谈话时，上海商人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上海资本家自称“产业界”。毛主席说，你们产业界在新中国是四个朋友之一，我们是联合你们的，四个朋友缺一不可。他们问：“那么产业界的

地位摆在哪里呢？”他们说，我们的报纸只说工人如何好，一点坏处也没有；资本家如何坏，一点好处也没有。他们并且说：“我们在报纸上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险的。”毛主席说，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忌，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上海商人提出的问题我们要注意。我们说在报纸上宣传资本家别超过宣传工人，没有说对于自由资产阶级一点也不宣传。所以在宣传上要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地位。我们要注意把工人放在第一，但也要照顾资本家，特别是在生产上、经济上，资本家比我们有办法，发展生产应该首先和资本家合作，资本家在城市生产方面占很高的地位。

今后天津市的工作如何做？要看你们自己的思想认识够不够。我们同志的认识是有一些毛病的。为了今后把天津管好，把关系搞好，使生产得到发展，我们要进行以下工作：

一、必须切实地组织好对外贸易，这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是人民的最大利益之一。这一工作天津做不好，整个华北也是做不好的。前些日子，上海的船到了天津，老百姓认为对外贸易要开始了，街谈巷议，眉开眼笑，而我们好多外地来的干部，对这个问题多不了解。

要争取出口。应出口的尽可能出口，不应出口的要限制出口。为了发展生产必需进口的，应尽可能进口，凡不必需的东西，尽量不进口。为了把进出口管好，国家要管制对外贸易，对它加以统制。过去因受帝国主义侵略不能统制，今天必须统制。不这样，帝国主义势力仍旧会侵入。但今天管制应放宽些，不要统制太严，统制死了，不要因统制而妨害正当进出口贸易。海关的税收率应配合对外贸易的发展，不应妨害它发展，所以要由国家管制。国家与私人的出口都算作输出。允许

私人出口进口东西，国家统销的出口货，有些也可以公私合办，但统销的名义不取消。不需要进口的，中国能制造的东西，不许进口。不应进口的进口了，就妨害我们的生产。天津有的资本家讲，有二十几种货物不应进口的却进口了，这样一来有很多家工厂就得关门，这就妨碍了天津的生产。

对外贸易的管理、统制、税收、海关等工作，都应加以改善。应当由工会、公安局等设立海员俱乐部，招待中外海员工人，照顾他们，跟他们谈话，卖给他们东西（如卖给他们手工业品不是很好吗？还可赚钱），送他们上船。曾经有一个海员给我们写信，说他买不到东西，很不满意。我们只反对帝国主义，但外国的海员工人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应当加以好好招待。把外国工人看成帝国主义分子，又把阵线搞乱了。

我们的人能够组织对外贸易、了解对外贸易的太少了。搞进出口贸易，可以组织对外贸委员会，要吸收资本家参加，他们比我们熟悉。对外贸易应公私兼顾，如进口的原料，公私双方都买一点。所以我们必须和资本家商量，和国营工厂、私营工厂商量，共同把对外贸易搞好。外汇也要管好。有一个人对我说：“外汇牌价太低妨害出口。”所以我们要跟他们多商量，多研究，我们自己不懂，又不研究，那是搞不好的。特别是那些资本家的话不可不听，当然也不可尽听。

二、必须切实地、迅速地沟通城乡关系。城乡之间过去是对立的，今天要使之畅通，使货畅其流。城乡物资周转宜灵活，过去打断了，今后要改善这种状况，使城市工业品与乡村农产品相互交换的关系发达起来，灵活起来。在这方面又要与资本家商人合作。今天正好乡村区党委的同志也来了，你们回去要把城乡关系搞好。听说有的乡间贸易公司，看见去了商人，便当成敌人，把他挤走。我们贸易公司不能把他们看成敌

人。天津有一个外国人经营的蛋厂停产了，我们外事处的同志和他们商量，要他们开工。他们说：“我们正想开工，但你们得供给一百五十万个鸡蛋。”我们的贸易公司无法供给，外事处要他们自己下乡去收购。但是他们一到乡下，就有人说：“帝国主义分子来了，赶走他。”结果蛋厂开不了，工人被遣散，这是一笔大损失。如果这个厂子开了，工人可以做工，农民可以卖蛋，税收也可以增加，这是一笔好生意。

税收也有问题。听说到乡下买棉花抽税，运进城又抽税，卖出又抽税，制成纱又抽税，由棉变成布，中间不知要抽多少税。还说：“反正公家抽的是公家的税，多抽点不要紧。”像这样又怎么能货畅其流，发展生产呢？当然有些税是必须抽的，但不应过多。

贸易公司、商人、工厂应合作，天津应组织农产品收购委员会，运输、价钱、税收等问题应共同商量。对中小商人要给些利益。农民到天津来卖东西，也常有走不进来的，抽税也很多。

为了做生意，邮政电讯应畅通。现在我们跟上海电讯能通，而与我们解放区的城市石家庄、沈阳、张家口反而不通电话。其实这是很容易通话的。电讯通了，对公私商人做买卖都方便。

还应组织交易市场，组织农民物资交易所。各机关买东西也可组织机关合作社统一供给。推销城市工业品也可组织百货商场、推销所等，公私商品都可以在这里推销。

为了把城乡关系搞好，需要我们政府的贸易公司领导，跟资本家商量，共同努力，使华北人民的生活得以改善。这样就活动起来了，活跃起来了，从而刺激了生产，东西也多起来了。

城乡关系问题，城乡干部都应好好讨论。搞好城乡畅通，对城市、对乡村都有利，对外贸易也能做好，不致于海外来船后，空船回去。特别像猪鬃、皮毛、骨头、鸡毛等，都是农村出产的，这些东西能出口，对人民利益很大，对农村发展副业利益很大。

沟通城乡关系，问题很多，如资本问题、收集问题等，都要想想。

三、必须贯彻公私兼顾政策。我们党、政府、贸易局、公营工厂，必须主动地联合资本家，主动地同他们合作，过去不找资本家，这种态度是不妥的。要与资本家商量，哪些事公家可以办，哪些私人可以办；商量如何做生意，如何向他们订货，供给原料等，这样公私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生产体系。工业生产不比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比较单纯，工业生产则很复杂，很多方面都要配合起来，才能好好地生产。成品推销市场，原料来源供给，要跟私人工厂商量，必须公私兼顾。如棉花，他们缺少，也应分一点给他们。在市场上，私人销一点，公家也销一点。价格也应彼此商量一下。所以在原料、市场、价格方面都要跟资本家研究，商量出公私两利的方法。原料、市场适当分配，不要使一方独占，价格不要各自任意提高或降低，彼此竞争，这样才能使公营工厂和私营工厂配合发展。但有些调皮的资本家，不愿与国家协商的，不顾人民利益只顾自己利益的，我们就要给以适当的打击。列宁说，有文明的资本家和野蛮的资本家，我们要打击野蛮的资本家。只要不是这样的人，我们都要主动跟他们合作。山东临清贸易局用故意跌价的办法，打击外地来做生意的资本家，企图独占市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如果我们不同资本家协商，而互相竞争，结果必定公私都

吃亏，都不能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我们要跟他们竞争，他们一定竞争不过我们，所以他们也愿意和我们合作。

所以公私兼顾必须贯彻，贯彻到买棉花中去，贯彻到买花生中去……争取自由资产阶级同我们合作。当然合作的条件是要加以缜密考虑的，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私人利益放在第二位，不要使私人没有利益了。

四、必须贯彻劳资两利的政策。天津解放后，工人向厂方提出了许多要求，资方已答应了，但有的要求增加工资过高，资本家担负不起，或只能临时担负，长久不了。同时因工人待遇过高，使工业品价格提高，农民吃亏。

有一些要求是不适当的，如强迫资本家雇工人，或把临时工都改为长期工等。有些是应该改可能改的，有些是不可能改的，如不应改为长期工、不可能改为长期工的，硬要改为长期工。这些要求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

另外工厂工人有些行动是不合理的，如不遵守厂规，不听管理人员指挥，上下班随便，破坏劳动纪律，资方又不敢管。还有工人在生产时间开会，搞许多游艺节目，耽误生产，这些行动都对生产不利，所以说是不合理的。

这些要求在工人方面是有其原因的，不能单纯责备工人。过去资方压迫剥削工人，随意解雇工人，有很多不合理的措施。那时是资方一利而不是劳资两利。这就是今天工人产生劳方一利的历史原因，但这是不正确的，这样做是不好的。目前工人中间，劳资中间，这一偏向如果不迅速加以批评纠正，就会成为系统的错误，陷入“左”倾冒险主义。这是工人的自杀政策，过去犯过很多这类错误，今天又产生了，应该很快纠正。批评时态度要好，要进行说服教育。但一定要肯定这是不对的，不仅对工人不利，对农民也不利。现在已经产生了

“左”倾偏向，如继续发展下去就更有害了：资本家不安心，工厂关门，工人失业……所以必须号召工人做到劳资两利，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应该规定一个劳资关系的处理办法，由军管会规定并宣布执行。

（一）所有公私工厂尽可能保证工人职员解放前的生活水准，不得降低（有些工厂虽然说是原职原薪但实际上降低了）。有特殊困难必须降低生活水准的，也一定要经过工会与工人同意。

（二）目前是军事时期，经济困难，提高工人生活水准暂时还不可能，但将来一定能提高，共产党也一定帮助提高。今天不可能提高，有的还要暂时忍耐痛苦，应向工人说明，请他们原谅。将来按照生产发展情况可以逐渐提高。目前一部分工厂，由于过去工资太低，现在可以也可能调整的，可作适当调整。但这也不是没有限制的，现在有增加好几次的，使资本家惶恐不安。所以现在应该规定增加工资的最高额，是不是最高不得超过实际工资的百分之五十？最低是不增加。实际工资包括伙食住房等。至于规定最低工资，劳大决议曾有过规定，但我们中国还不曾实行过，是否行得通还不知道，这是否可以不规定，只维持原来工资不动，太低的有可能增加时才增加。今天如果把工资规定得过高，很多工人会失业。如有特殊困难须增加，由总工会提出政府批准也可以增加。

（三）一切公私工厂必须开工，努力生产，不得怠工。如有确实困难不能复工或不得不停业、停工、裁减工人时，必须经政府批准。

（四）私营企业主，为了生产的需要，可以雇请或辞退工人，但一切都必须是为了生产的需要。在雇请或辞退工人时，必须依照生产需要的最高原则。如为政治上的理由开除工人，

必须经过政府的批准。工会不得强迫厂方雇请或辞退工人。资本家的雇辞工人权是他的生死问题，但这也是工人的生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劳资双方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在斗争。如何使这矛盾缓和一下，工会应注意此事。要把失了业的熟练工人、技术工人、老工人、正式工人进行登记，并由政府劳动局设立职业介绍所，规定雇请工人时只准到职业介绍所去雇请。还可商讨由政府拿一笔款，资本家拿一笔款，作为失业救济基金，以便对个别的、熟练的技术工人加以救济。这虽是复杂的事情，但是可以办的。

（五）雇主必须正当地使用和管理工人，不准打骂和虐待工人，但工人必须遵守厂规，服从指挥。对旧厂规，经资本家修改，工人讨论，工会同意，政府批准实行后，大家就得遵守。工人不得不听指挥。

（六）工人开会或搞其他活动，必须在工作时间以外进行，不准占用工作时间。而在工作时间以外进行活动，资方不得干涉。

（七）每个工厂需要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做工会工作的人，可以脱离生产，生活费用由工会负担。工会经费今后应独立起来，要造预算，政府充分供给，使工会有钱进行各种活动。脱离生产的工会工作人员的薪金，照原来工厂薪金发给。

将来工会应筹备自己的经费，工人交纳会费（占薪金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那时可以不要政府津贴了。现在这项预算不要轻易改，必须予以保障。私营工厂工会的经费也由政府给。

（八）工人对厂方提出的要求条件，应交工会加以研究分析，由工会向厂方交涉。一切劳资纠纷都由总工会集中审查解

决。要分析是不是正当的要求，哪些可能办到，哪些不可能办到，正当的可能办到的要求，代表工人去交涉，否则说服工人不要提出。困难就在于分清何为正当不正当，何为可能不可能。

这样由总工会来解决，才能增强工会的威信，工会的作用也会提高，否则工会就没有威信，即使有也是官办的威信了。党、军代表等各方都要大力培养工会的威信。有些厂长、军代表、贸易机关负责人，怕工会威信高，说：“工会威信高了，我就不好做了”。这是不应该的，是完全错误的。一个工厂工会威信越高，厂长越好当，工厂工作更好做，党才有发展，工厂行政才有推进。反之是没有办法做好的。

工会是桥梁，没有它，政府与工人就建立不起联系。如果劳资双方纠纷不能商量解决，则由劳动局解决，工会可向劳动局提要求提条件，资本家也可以向劳动局提要求提条件，由政府劳动局调解和仲裁。天津资本家对于这类问题正呼吁无门，我们可以开这样一个门。

我想关于劳资问题，军管会颁布一些规定是必要的。

宣布这个规定，工资过高的工厂的工人可能会不太高兴。所以今后我们要特别注意教育说服工人，别把资本家挤垮，不要为眼前部分的利益妨碍了长远的利益。正像黄敬市长讲的：“不要吃母鸡，要慢慢吃鸡蛋。”

现在工人在政治上是翻身了，但在经济上整个来讲，工人今天还不可能翻身，生活稍微改善一下是可能的，很大的改善是不可能的。经济上获得大的收获是不容易的，因为今天的工人还没有获得更大的解放，还受资本家剥削，不到社会主义是不能在经济上完全解放无产阶级的。就是国营工厂的工人，也还要艰苦奋斗一个时期，生活才能有较大的改善。

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今天还不能完全废除。有人说：“有人来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来剥削，我们就失业了，失业还不如业”。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才受痛苦，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才受痛苦。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的，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

有些老实的资本家想多办一些工厂，但怕剥削得多，罪恶大。如启新洋灰厂经理说：我办了第三个厂，就不想办第四个厂，怕第四个厂子办起来后成了大资本家，剥削越多，罪恶越大，就要受审判枪毙了。

有些资本家想从希腊字典里找依据，把剥削者这个词翻译为利益分润者。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也看过，越看越害怕。

我问他们，你说资本家是不是剥削？如永利公司八百元开办的，今天已有这么大的发展，还不是剥削来的？大股东也好，小股东也好，都是剥削；分红分得多也好，分得少也好，还不是把剥削来的钱揣在腰包里？

有的资本家说：“生产发展后股息就大了。”他们提议要限制股息，主张过多的股息归国家。我想这恐怕是资本家在试探我们，看我们准不准许他们赚钱。我告诉他们，我们现在正希望把工厂股息提高。工厂利润提高了，商业利润减低了，投机游资就会转向工业。所以尽管提高股息就是提高剥削，但希望你们提高这些剥削，因为这样做对大家有利。如东亚毛纺织厂资本家现在剥削一千二百人，要能多办工厂，剥削两千人、两万人那更好。工人要求复工就是要求剥削。不论怎样讲剥削是事实。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

资本主义在刚发展起来的时候，有生气。马克思在一百年

以前，就认为资本家对发展生产、组织生产是有历史功绩的。资产阶级后来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就腐化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功有过，今天是功大于过。但我们也要限制它，不能使中国变成帝国主义，也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烧掉成品，或把产品扔在海里。我对资本家说：“你们又不丢，又不烧，那只好走社会主义。”我们可以和平转入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资本家也会高兴的，不然就会生产过剩。所以我们应该慢慢地准备走上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慢慢准备，经过许多步骤，那时资本家就不会感到十分痛苦。

今天工人阶级还得受资本家剥削。那么农民呢？农民翻身可以消灭封建制度，分得土地，但工人还不能得到工厂。工人翻身与农民翻身不同，如照农民那样翻法，就翻坏了。工人翻身这口号是不能空洞宣传的，容易与农民翻身连在一起，如不加以区分，那就坏了。关于剥削问题，这不是几个资本家可以负责的，剥削行为不是由意识决定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整个社会制度问题。中国工人阶级还要忍受一个时期的剥削痛苦。今天资本家的剥削是个利润分配问题，今后可以加税，使资本家的一部分利润又变为国家财产，国家又“剥削”了资本家，很好呵！

关于劳资问题，要贯彻劳资两利的政策。对于工人过高的要求，要进行说服教育，说服不了，要报告上级，由市长去说服。我们共产党必须向工人郑重表明态度，说明利害，不然到工厂关了门，工人失业吃了亏，他们该说了：“你们为什么不早讲！”所以应该早讲。

除劳资政策以外，还要告诉工人注意提高生产，否则改善工人生活是不可能的。工厂负责人必须将工厂业务向工会与工人作报告，不外是原料、制造、销售三件事，缺一不可。进行

生产，必须有原料，原料要好一点，便宜一点，生产时还要节省一点。产品质量要好，产量要高，原料、机器要节省。销售就需要有市场。原料、制造、销售这一过程，都应使工人了解，要计划原料，保证制造，并能销售。要把这些情况经常告诉工人，和工人特别是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商量。国营工厂这样做，同时也要说服资本家老实地向工人作报告。没有原料与销售计划，只有制造计划，不算完全的生产计划。必须把全副工作计划向工人报告，把有利条件和困难在哪里，都告诉工人，困难由大家克服，如军队一样，只有把情况说明，才能打胜仗。这样才能发挥工人的积极性，生产才能搞好。在厂内实行生产民主，有利于发挥工人的积极性。

在城市里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国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第三是发展手工业生产。但是我们的一些干部倒以手工业生产为主，不重视资本主义生产，这是不对的。

国营企业中现在在搞民主改革，工厂中有些冗员要裁减，有些机构不合理要改造。工厂也要实行精兵简政，特别是上层机构庞大，应该减缩。要团结职员工人，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雇佣劳动者，是脑力劳动，工人大多是体力劳动。一般职员应包括在工人阶级以内（他们不同于经理等压迫工人的职员）。鼓动工人来反对职员原则上是不对的。过去职员对工人不好，是由于国民党利用职员控制工人，制造裂痕。今天我们要消灭职员工人间的裂痕，方法是向职员讲明白，让有错误的职员进行自我批评，认错道歉，使工人谅解他们过去的错误，一般的既往不咎，有大问题的要宽大处理，但这些事要快些处理。要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职员如认为让工人批评了就不能再管工人了，这是不对的。这问题明

天再讲，今天不多讲了。

国营工厂中的职员工人关系问题和私营工厂中的劳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必须很快解决，解决以后，还应把经济机构组织好。

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都要搞好。为了搞好这些关系，首先公家与公家的关系要搞好。现在不只是国营私营彼此不相往来，就是国营各部门也有这种情况，不是互通有无，而是互相封锁，上面只看到有人来要东西，而没有人来报告我这里有什么东西，这样如何能把经济组织起来。工业经济是一个整体，不容分割，把各自管理的企业、部门看成是一个独立国，是无组织无纪律状态。今后必须规定各企业、部门的请示报告制度，不准打埋伏。军管会也要严格一些，不但要管资本家，而且要管共产党员。今后还得实行类似派经济专员的制度，经济专员可以代表中央调动一切。公家与公家配合好，再与对外贸易配合好，再与乡村配合好，再与私人资本家配合好，这样四面八方就照顾到了。军管会不仅是管理军事管理政治的，而且是管理经济的，军管会在这方面要负起责来，要召集经济会议，各经济组织的代表要互相报告情况，互相了解情况，互通有无。可以组织经济委员会，还可以与资本家商人在一起组织进出口贸易委员会、原料采购委员会等，研究政策，统一领导。这些机构、组织，我还未想好，为了发展生产，管好天津，这些工作是要做的。

做好这些工作的基础，就是依靠群众。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把我们的队伍组织好。工人阶级是不是可靠呢？一般讲是可靠的。马克思讲，共产党唯一依靠的是工人阶级。共产党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实现

革命的领导权，唯一的依靠是工人阶级。

如果我们犯了错误，不去教育工人，不向工人进行说服工作，那么工人就可能不撑你的腰。为了使工人阶级成为共产党的可靠的力量，我们必须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工人阶级有了认识，有了觉悟，就有了力量，工会有了威信，我们党又掌握了工会的领导，工人阶级就可靠了。不要以为依靠工人阶级是没有问题的。中国工人阶级离开党很久了，国民党在其中有一定的工作，如果我们对工人工作进行得不好，工人阶级可能不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对工人阶级切实进行组织工作。除开工人阶级以外，在学生、小资产阶级、农民独立小生产者、小手工业者中，我们都要进行组织工作。这是管好天津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组织各委员会，发展生产。所以目前天津的工作，工人群众工作是一环，经济管理工作是一环。今天工厂里党的力量不太多，不要把大力量放在党务工作方面去。要把最好的足够的干部放在经济管理部门和工会工作的机关。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刊印。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 朱 德

国民党反动派业已拒绝接受和平条件，坚持其反民族反人民的罪恶的战争立场。全国人民希望人民解放军迅速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已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实现全国人民所渴望的真正的统一。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深望各界人民予以协助。兹特宣布约法八章，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之。

(一) 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各界人民，不分阶级、信仰和职业，均望保持秩序，采取和人民解放军合作的态度。人民解放军则采取和各界人民合作的态度。如有反革命分子或其他破坏分子，乘机捣乱、抢劫或破坏者，定予严办。

(二) 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凡属私人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农场、牧场等，一律保护，不受侵犯。希望各业员工照常生产，各行商店照常营业。

(三) 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

* 这个布告是毛泽东起草的。

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农牧业家私人股份经调查属实者，当承认其所有权。所有在官僚资本企业中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财、机器、图表、账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凡愿继续服务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

（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凡在这些机关供职的人员，均望照常供职，人民解放军一律保护，不受侵犯。

（五）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如有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则须予以惩办。

（六）为着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凡自动投诚报到，并将所有武器交出者，概不追究。其有抗不报到，或隐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窝藏不报者，须受相当的处分。

（七）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但是废除这种制度，必须是有准备和有步骤的。一般地说来，应当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并且需要人民解

放军到达和工作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后，方才谈得到认真地解决土地问题。农民群众应当组织起来，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行各项初步的改革工作。同时，努力耕种，使现有的农业生产水平不致降低，然后逐步加以提高，借以改善农民生活，并供给城市人民以商品粮食。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

（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一切外国侨民各安生业，保持秩序。一切外国侨民，必须遵守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令，不得进行间谍活动，不得有反对中国民族独立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行为，不得包庇中国战争罪犯、反革命分子及其他罪犯。否则，当受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律制裁。

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许妄取民间一针一线。希望我全体人民，一律安居乐业，切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切切此布。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 德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南京解放后的 外交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总前委，刘邓张李，粟谭张^{〔1〕}：

南京解放后，关于外交问题，特作如下指示：

(一) 对驻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及市政府仍本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的理由，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也不要文字上和口头上做任何承认他们为大使或公使的表示。但对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及其中人员的安全，则应负责保护，不加侮辱，同时，亦不必进行登记。

(二) 我方人员对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及其中外交人员仍采取冷淡态度，绝不要主动地去理睬他们。我军管会及市政府成立，只贴布告，发报纸，发广播，绝不要以公文通知他们。但他们如果经过中国有关朋友（如吴贻芳、陈裕光等人）向我们表示意见，我们可从旁听取，但不表示态度；如果他们找来我市政府，外国侨民事务处接洽，我们可以把他们当做外国侨民接待，听取他们的意见，转达上级，但须声明绝不承认以他们为外交人员来接待。

* 这个指示是周恩来起草的。

(三) 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如要求发个人出城通行证及汽车通行证，在军事戒严解除后，可以告诉他们，如果以私人名义请求，可发给特别通行证，个人出城限在南京四周一定区域，汽车通行须有一定范围，数量每个大、公使馆容许其使用一个至两个汽车。

(四) 各国在南京的记者及通讯社，暂时仍让他们发电发稿一个时候，不作任何表示，看其情况如何，再作处置。

(五) 各国大使馆、公使馆的无线电台亦暂时置之不理，听其与外间通报。

(六) 各国大使馆、公使馆的警卫人员及其武器装备，在其使馆范围内可暂不干涉，如出馆行动，则不容许其着军装出外。

(七) 其他关于外国侨民等项仍执行今年一月十九日指示不变。

(八) 派黄华为南京市政府外国侨民事务处处长，即随漱石^{〔2〕}、刘晓南下。

中 央

卯有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1〕指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粟裕、谭震林、张震。

〔2〕即饶漱石。

中共中央对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 城市指示草案的批示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华东局并告各局：

(一) 卯江关于接管江南城市指示草案，中央同意，望即发布。

(二) 根据平、津经验，军管会能很好地接收城市及工厂和资财，但军管会不能经营企业和工厂。故军管会在接收后，应迅速将企业、工厂和物资，分别交给各适当的负责的机关管理和经营。例如将市政工业及其他若干工商业交市政府管理经营，其他工商业则组织若干公司来负责经营，否则很难开工营业，即使勉强开工，亦难长期维持。

(三) 根据平、津经验，新解放的城市照旧收税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但旧的收税人员，因在群众中种下很大的恶感，群众不信任。故由旧人员去收税，普遍遭到群众的反对和抵制，后来委任我军人员任税收局长，并由我军人员带领旧人员去收税，发给我人民政府税收局的收条，人民才踊跃交税。这一经验，望记取。

(四) 城市解放后，许多房客不交房租，房东亦不敢收房租，因此人心长期不安。军管会与人民政府，对此不应缄默，长期不表示态度，应正式宣布除官僚资本之房屋应予没收外，

一切私人房屋的所有权应予保障，房客应继续交纳房租，租金多少应由房客与房东议定。有纠纷者应由政府或人民法庭调解仲裁解决之。

（五）城市解放后，常有许多自发的工人斗争。有些工人、店员，在老板恐慌情绪下，分了店铺和作坊。我们有些区委和支部，亦任意处理劳资纠纷。因此，在城市中常造成若干劳资斗争中的无政府状态，破坏我们的政策。故在城市解放后，应重新发表新华社的“二七”社论及其他若干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并须规定每个城市的劳资问题及公营工厂中工人与管理机关的争执问题，均须一律经过市总工会及市政府劳动局审查和处理。军管会及党的市委则须派得力人去指导总工会及劳动局的工作，使其能有效率地解决一切劳资问题及公营工厂中工人要求问题。同时并须告诫各支部和区委及其他机关，不要不经请示任意处理劳资问题。

（六）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企业中，大多有大批冗员及官僚制度，例如工厂中的警卫科、厂警等，工人、职员十分不满，要求迅速改革。而这些人员和机构，也可以迅速改革。故在确定工厂管理关系后，应即发动工人迅速改革这些制度，以利生产。

中 央

卯有

附：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指示 草案的请示报告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

中央：

下列指示草案请审查修改，以便下达。

华 东 局

卯江

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草案）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

我军渡江南进，江南各城市即将解放，特根据中央各种指示的原则，与各地接管城市的经验，拟定下列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

一、对新收复的人口在五万以上的城市或工业区，均应实行一个时期的军事管理制度。在占领城市初期，应指定攻城部队直接最高指挥机关军政负责同志，与地方党政若干负责人，组织该城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为该城市最高权力机关，凡入城部队及党政军民机关，与各接管工作人员，均须接受军管会的统一指挥。军管会的基本任务为：镇压反革命分子之活动，肃清反动武装的残余势力，恢复并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及一切正当的权利，建立革命政权，保证城市政策的正确的执行，与有秩序地进行各种接管工作，协助工人

职员，青年学生，及其他劳动群众组织起来，作为城市革命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在上述基本任务大体完成，城市秩序安定，一切市政机关建立并经过上级之批准以后，始得取消军管制。

二、在军管会领导下，可委任市长，并成立市政府。凡我党我军既定之各项政策，应以市政府名义公布；凡带紧急性、临时性或试验性的处置，则可以军管会的命令行之。在进入城市，实行接管之前，应多方收集该城有关材料（事先应特别注意收集该城地图及电话簿），调查该城一切机关、工厂、仓库的具体情况及其位置，并针对该城的实际情况，来建立接收组织和配备干部，以便入城后，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实行各按系统整套接收。在军管会下要有足够的经过专门训练的、纪律良好的、有相当城市知识的专门警备部队和公安武装，以便看守工厂、仓库、机关、公共建筑物和巡逻街道，防止特务破坏，与市民偷窃（同时各接收系统亦应各自配备看管工厂、仓库之专门部队）。各部接收工作人员应随同部队迅速入城，并事先准备好工作需要的运输工具与食粮之供给。对城市人民的粮食与煤炭的供给，亦须预作必要的准备。军管会入城后，应首先注意恢复电力供给（使一切市政工业能够继续工作），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使商人敢于开市做生意），迅速恢复交通秩序（可利用旧有警察徒手站岗、维持交通），迅速接管各公营企业与公共机关，注意防火消防工作与城市卫生工作。对一切接管之工厂，应按原职原薪立即复工，这是保护工厂，安定人心，解决工人生活的基本环节。我们对一切新收复的城市，必须做到接收得好和管理得好，并必须“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二中全会决议）

三、城市秩序的好坏，首先决定于入城部队的纪律好坏，特别决定于部队干部与接收干部能否忠实执行城市政策与能否严格遵守入城纪律。因此一切部队从军、政、后勤干部直到战士，一切接管机关从党、政、军、民、财经、文教干部直到勤杂人员，在入城前，必须普遍地、反复地、深入地进行党的城市政策的教育，及入城纪律的教育与接管城市的经验教育。一切部队干部及接收人员必须坚决遵守下列入城守则：

第一，一切机关、部队、公营企业人员、采购人员、民兵、民工，凡未持有军管会所发之通行证或佩带军管会特许之证章者，一律禁止出入市区及工厂区。严厉处罚一切破坏秩序，损坏公物及盗窃国家财产分子。

第二，一切接收人员与入城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执行人民解放军总部及华东军区所颁布的一切命令法规，严禁无纪律无政府现象。

第三，入城部队只有保护城市工商业之责，无没收处理之权。除易于爆炸和燃烧的物资，如炸药、弹药、汽油等，应迅速疏散出城，并呈报军管会统一处理外，严禁搬运机器、物资和器材，严禁擅拆车辆及零件。

第四，除敌方武装散匪及其他持枪抵抗的人员应加俘虏，及重要特务、间谍与破坏分子和重要战犯应加速捕外，严禁乱打人乱抓人的现象。

第五，任何部队有收集散在战场上的弹药、武器，其他军用品及军用物资之责，但无单独处理之权，必须开列清单呈报军管会转报华东军区统一处理。严禁各部队后勤供给人员离开本身职务，投机取巧，乱抓物资或抢购物资。

第六，一切入城的机关及部队，必须遵照军管会所指定的房屋居住，服从公共房屋管理处的管理与分配，并教育一切人

员爱护公物及使用室内外一切新式设备与卫生设备的办法。严禁擅移器具设备及盗窃破坏国家财产，所有部队、机关一律不准驻在工厂、医院、学校和教堂。

第七，在战斗结束后，除需要维持城市秩序一定数量的部队外，其他部队一律撤出城外，并在撤出前必须将任务移交清楚。一切驻在城市部队应制定适合城市生活的制度和规则。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不许在市内无故鸣枪，如需军事演习和练习射击，必须得到军管会的批准，并须到军管会所指定的郊外地点演习。

第八，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应实行公平交易，不得强买强卖。所有部队人员及公务人员乘坐公共汽车或进入公共游戏场所，必须照规买票。所有汽车及其他车辆入城，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并服从交通警察之指挥。

第九，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应保持艰苦朴素作风，不准私受馈赠、私取公物，反对贪污腐化堕落行为。

第十，厉行奖罚制度，对遵守纪律、遵守城市政策有功者，应给予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对违反纪律、违反城市政策者，必须彻底追究，并依情节轻重依法处理。

四、我军进入城市，“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守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当我军进入江南初期，必须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及对各城市进行系统的接管工作，而尚不能有系统的全面的社会改革。因此我们在接管江南各城市时，应采取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的方针，以便力求主动，避免被动，并必须实行以下各项政策：

第一，对一切官僚资本的企业及其他各种公共企业，如工厂、矿山、铁路、邮电、轮船、银行、电灯、电话、自来水、商店、仓库等等，必须一律接管。我们在接管官僚资本企业与公共企业时，应采取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办法。同时必须严格的注意到不要打乱企业组织的原来机构。在接收阶段，一方面应责成该企业各原有机关的主要负责人负责办理移交手续；另一方面可以分别召集该企业各部工人会议或工人代表会议，宣传政策，发动工人群众配合。如果仅有自上而下按照系统的接收，而无自下而上工人、职员的审查和检举相配合，是接收不好的。对于接管来的企业的原有人员（包括厂长、局长、监工、工程师及其他职员），除个别破坏分子必须逮捕处分外，应一律留用，并令其继续担任原来职务。军管会只派军事代表去监督其生产，而不应干涉或代替其职务。如某个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逃跑或原有负责人劣迹昭著，非撤换不可者，亦应从本企业中提拔适当的人员代理（如第一级负责人不在，可委第二或第三级负责人代理）。对企业中的各种组织及制度应照旧保持，不应任意改变或废除。对旧的实际工资标准或等级及其实行多年的奖励制度亦应暂时照旧，不得取消或任意改订。旧制度中有须要加以改良者，旧人员中有须要加以调整者，均需的情况了解后再作必要与适当的处理。

第二，对私人经营的企业（如工厂、公司、商店、仓库、货栈等等）及一切民族工商业的财产，应一律保护不受侵犯。私人工商业中如有股东不明或部分股东确为重要战犯或为官僚资本者，应一律暂缓处理，但先行登记加以监督，防止转移资金货物。对私营企业应坚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一方面要教育说服工人不要提出过高的劳动条件，致使生产降低，经济衰落，工人失业，另一方面要严重警惕资本家故意消

极怠工或借故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及其他待遇。如劳资间有纠纷时，可由军管会召集双方调解或仲裁之。必须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富消灭封建的办法错误的应用到城市，同时对故意消极怠工的资本家应给以必要的适当的处罚。

第三，对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民社党及特务机关等反动组织，应由军管会或市政府出布告，宣布解散，并没收其所有的公产、档案，严禁其继续进行任何活动。具体办法应遵照中央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处理之。对国民党政权机关人员及军事后方机关人员，除首要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必须逮捕法办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或逮捕，并责成其负责保护各机关资材、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显著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须经过集中训练审查改造后，可以分别录用。江南各大城市解放后，对保甲人员可暂时利用，使之有助于社会治安的维持。其办法可按照中央关于暂时利用旧保甲长的通知具体处理。

第四，对学校与文化教育机关（如大学、中学、小学、图书馆、博物馆、科学试验室、体育场所等等），应采取严格的保护政策。要迅速派人到各学校宣布方针，并与他们开会具体商定维持的办法。对原有学校（除国民党党校、军事学校外）一概采取维持原状，逐渐改良的方针。例如：开始在课程方面，应取消其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其余暂时照旧。例如：在教职员方面，除去掉极少数的反动分子外，其余应一概采取继续工作。

第五，应建立各界代表会，作为军管会和市政府，在军管时期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会议机关。各界代表会的组织和职责，应遵照中央关于成立各界代表会的指示原则进行。

第六，我军进入江南应确定人民银行所发行的人民票为本币。对伪币金圆券应采取排挤方针，辅之以限额收兑。人民票与金圆券的比值及限额收兑的具体办法，应视当时情况规定之。

第七，我军进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应迅速出报纸及开始播音，以广泛宣传我党政策及政府法令、布告等。但一般标语口号必须事先请示中央批准，始可张贴。对国民党、三青团及其他反动派的报纸、刊物和通讯社，应一律没收接管。对个人私人名义经营而有确实反动政治背景的反共反人民的报纸、刊物、通讯社等，也可以没收接管。其反动政治背景一时无法弄清者，则应经过调查及法庭判决加以处理。对进步的和中间性的民营报纸、刊物、通讯社，可依法登记，在民主政府指导下进行营业。对敌方政府、军队及党部管理之电台，应全部接收。对大城市广播电台及广播人员的政策，应遵照中央指示的原则办理。

第八，对国民党监狱在押人犯，须经过审查分别处理。对革命分子应立即欢迎其出狱。对重大刑事案犯，如盗匪犯、杀人犯等仍宜拘禁，听候处理。对国民党的司法机关的接管，应照中央关于接管平津司法机关指示原则办理。

第九，对新收复城市的旧有各种税收，原则上应该一律暂时照旧征收。除少数苛捐杂税（如防共捐、戡乱税等）应即停止征收外，对一般旧有税收税率及税则，应待调查研究后再行改革。在我税收干部缺乏条件下，除对个别为人民所痛恨的旧税务人员应加处分外，对一般旧税务人员亦可暂时利用，以便逐渐训练改造或待将来再行调换。

第十，必须组织公共房产管理委员会，并在此委员会下设立公共房产管理处，统一管理分配城市中一切公共房屋，不

许任何例外。一切公共房屋连同房屋中的家具、设备、衣被，草木等在内，不论有无机关或个人居住和已否分配，一律归房产管理委员会接收和保管，并进行登记，造具清册，成为国家财产。对各城市公共房屋的具体处理办法，应遵照中央关于城市中公共房产问题决定的规定。对私人房屋暂采一律照旧缴纳房租的办法，以后房租亦应暂由房客与房东协议规定之。

第十一，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家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般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教堂及一般外侨亦应采取保护方针，如外侨有犯罪行为，应依法处理，但除现行犯外，必须先报华东军区，重要者则必须转呈中央批准，始得逮捕与执行。对外人所办文化教育机关及其他事业的处理，均须遵照中央外交工作指示原则执行，且必须严格遵守请示报告制度。

四月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对待驻华 外交机关人员及外侨政策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总前委，刘邓张李，粟谭，并告林罗刘谭^{〔1〕}：

据美国广播称，我人民解放军曾进入南京美大使馆施行室内检查，并宣称，该室器具不久将为人民所有，云云。不管此事是否确实，你们均应立即传令全军，凡对外国大使、公使、领事和一切外交机关人员及外国侨民施行室内检查，采取任何行动，必须事先报告上级，至少须得到中央局及野战军前委一级的批准，方得实施。凡上述行动未经中央规定者，更须电告中央请求批准。对待各国驻华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他外交机关，早经规定一律予以保护，非经特许不得施行室内检查。此次南京检查如果属实，应认为为违犯纪律行为，速予查究。野战军以下任何部队及其首长均无权未经中央或中央局、野战军前委批准，擅自采取对待外国侨民超过中央规定的行动。在战场上，由于外国军队、军舰、空军及手持武器的外国人参加战斗行动，我们应该实行自卫，但同时必须报告野战军前委转报中央请求指示。在城乡卫戍警戒上，如遇有外国侨民抵抗我军途中检查甚或手持武器企图行凶者，容许我军不经报

* 这个指示是周恩来起草的。

告批准，先行制止或逮捕。在紧急情况下，容许我执法军人实行自卫。南京现为各国大、公使馆驻在地区，我卫戍部队必须特别注意，望刘、邓、陈、饶^{〔2〕}立即注意此事，亲自掌握外交问题的处理，并督促陈士榘、袁仲贤加强对南京卫戍部队的训练和管理；一切有关外侨事件必须事先请示，不得擅自行动，严防敌特和外国间谍之挑衅。南京以外之各大城市，亦须照此办理。

中央 军委

卯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指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粟裕、谭震林，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

〔2〕指陈毅、饶漱石。

军委关于做好接收上海 准备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总前委，粟张，并告刘张李^{〔1〕}：

（一）你们不但要部署攻击杭州，而且要准备接收上海，以便在上海敌军假如迅速退走，上海人民要求你们进驻的时候，不致毫无准备，仓卒进去，陷于被动。（二）美国驻上海军舰为避免引起纠纷，有于二十六日下午撤退至长江口外之传说，是否如此待证。（三）如果美舰撤退，杭州又受威胁，国民党在沪军队有迅速撤走可能。加以上海资产阶级不赞成在上海打仗，故上海和平解决之可能性甚大。（四）为着多有一些准备时间，不使国民党过早退出上海、我军仓卒进入上海，请粟张注意不要使我军过于迫近上海。同时，争取在数日内完成进驻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国民党迅速退出上海时，我军亦不至毫无准备地仓卒进去。（五）准备情形，望筹划电告。（六）何时进驻上海，须得我们批准。

军 委
二十七日六时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指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中央军委关于稳住汤恩伯及 外交对策问题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总前委，粟张，并告刘张李^{〔1〕}：

(一) 为使汤恩伯在上海稳住一时期，以利我军先取杭州，然后有准备地夺取上海，我们认为，你们暂时不要去占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诸点，让上述各点由汤恩伯守起来，使他在上海尚不感觉直接的威胁。

(二) 美国军舰及一营陆战队，已于二十六日由上海撤至吴淞口外，美国只留下一艘载有医疗设备的军舰（医舰）在上海。英国的军舰伦敦号及永恒号亦和美舰一起退往吴淞口外，只留下驱逐舰黑天鹅号在上海（该舰被打伤，有伤兵留沪就医）。法国原有一艘军舰在上海，是否退出不明。英、美采取此种态度于我有利。

(三) 我方对英、美侨民（及一切外国侨民）及各国大使、公使、领事等外交人员，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员，应着重教育部队予以保护。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此事请邓、饶、陈^{〔2〕}、刘加以注意。

（四）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共的旧政策已破产，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关于侵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美国可能向我南京当局提出一个口头的或书面的抗议。但是只要我方不继续发生此类事件，美国是不会将此事扩大的。

（五）英军舰紫石英号事件，似乎是一个偶然事件，英国连抗议也没有提。因此我们除借此作宣传教育人民外，实际上我们亦不必扩大这件事。

中央军委

俭丑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指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2〕指邓小平、饶漱石、陈毅。

我们的私营银钱业政策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

私营银钱业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可能起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经过其正当的存放款、汇兑和其他正当业务，起着调剂社会资金和扶助有益于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发展的积极作用。这是应当受到保护和被允许存在与发展的。另一方面如果它们越出正当的业务范围，利用存款投机囤积，则又不仅不能起调剂社会资金和扶助有益于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反而会助长物价波动，妨碍正当工商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是有害的。为此我们对私营银钱业就必须严加管理，促使并限制其只能向有益于国民生计的方面发展，取缔其一切非法投机的行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发展生产，并有利于广大人民；只有这样，才符合于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的要求。这就是我们对私营银钱业的基本政策。昨天华北区私营银钱业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则正是这一政策的具体化。

生产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所以从事于货币信用受授的银钱业，是从属于生产，并应为生产服务的。如果脱离了生产的需要，就必然走上投机、冒险的道路。十余年来反动的国民党在经济上所做的事情，概括言之，就是便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掠夺，因而阻碍生产发展，使大部分的民族资本脱离生产，转向投机事业。一般银行、银

号、钱庄亦脱离其调剂社会金融，以扶助工业界生产的正当业务，而从事于金融投机，以及其他投机事业。特别在战争的情况下，许多私营银钱业吸收了社会闲散资金，从事囤积居奇，勒取非法利润。而四大家族控制下的所谓“国家银行”，则不但不与这些投机行为作斗争，而是专门领导投机，掠夺全国人民的财富，以充实四大家族的私囊。所以在反动的国民党统治的最近十余年来，私人行庄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这种银钱业的畸形发展，并不表示国民经济的繁荣，相反的是国民经济衰落，以至临近破产的表现。私营银钱业，不管它们自己进行投机活动或者供给资金帮助商人进行投机，它们的活动都是对生产事业有害的。我们对于反动的国民党统治所遗留下来的私营银钱业这个丑恶面，必须彻底肃清，必须把私营银钱业端正的放在发展生产的正确基础上。《华北区私营银钱业管理办法》第四、五、六等条在业务范围方面的规定，第八、九、十、十一、十二等条在资金方面的规定，及第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等条在资金运用及存款准备金方面之规定，正是根据这种精神。这在稳定金融、发展生产、保障存款人权利上说，都是十分应该和必要的。即在私营银钱业本身说，这些规定也是十分应该和必要的。不如此就不可能使私营银钱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积极作用，不如此就不能防止私营银钱业走投机冒险的道路，不如此就会影响市场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从而使私营银钱业丧失了存在和发展的根据。

华北已全部解放。我们华北区今后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生产。我们国民经济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只有把国营经济、私营经济和合作经济统统发展起来，才有希望在相当时期内，提高我们的生产水平，使我们的国家逐渐的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和这种情况相适应的是：如果私营银钱业遵守法令，经营

正当业务，为工农商业生产所需要，它是可以存在的和发展的。但是如果私营银钱业还想因袭反动的国民党时代的坏作风，不在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建设中做一部分有益的事情，只想看机会钻空子捞一把，那么它就会自绝前途。因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不能容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的。我们的国营经济，尤其是国家银行，为了人民利益，是一定要坚决和一切非法投机行为做斗争的。中国人民要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来发展生产，巩固自己的胜利。中国人民喜爱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有益于生产发展的事业；憎恶一切投机倒把，损公利私的行为。谁顺应这种愿望就能存在，否则就会被淘汰。

根据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刊印。

军委关于应准备早日接收 汉口汉阳给林彪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林罗，刘张李，萧陈^{〔1〕}，并告中原局：

（一）和谈破裂，桂系亦从来没有在具体行动上表示和我们妥协过，现在我们亦无和桂系进行妥协之必要。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消灭桂系及其他任何反动派。但是，我四野主力还要一个多月才能到达汉口附近，接收汉口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因此，白崇禧和中央联络的电台暂时仍不割断，萧陈前线亦应遵守前定界线不要超越，以免刺激汉口敌军惊慌，撤走得太早。在此意图下，如果滠口铁桥不十分重要，不十分难于修复，最好暂时不去抢占。但是如果滠口铁桥十分重要，被敌破坏后十分难于修复，则可以早日去抢占。但是抢占滠口后，白崇禧即可能放弃汉口汉阳两城，萧陈及中原局应准备早日接收汉口、汉阳。此事究以如何处置为适宜，本日已与林彪同志当面谈过，由林彪同志负责考虑答复，请萧陈及中原局向林再提供意见。（二）浠广不在划定范围之内，该处敌军应予消灭，不使决堤灌水。（三）从电到日起，萧陈归林罗直接指挥，解除刘邓^{〔2〕}张李对萧陈的全般指挥关系，但在工作配合上刘邓张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李仍得指挥萧陈。（四）无论怎样，萧陈及中原局应当迅即准备接收汉口汉阳两城，以免敌人退走，仓卒接收，毫无准备。

军 委

卯俭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指罗荣桓，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萧劲光、陈伯钧。

〔2〕指邓小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 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

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声明。四月二十六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二百五十二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吗？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他说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艾德礼说：人民解放军“准备让英舰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该舰要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艾德礼是在撒谎，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允许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人民解放军不希望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帮助渡江，或做任何别的什么事情。相

* 这个声明是毛泽东起草的。

反，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直到现在还没有同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艾德礼埋怨中国共产党因为没有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不愿意同外国政府的旧外交人员（国民党承认的领事）发生关系，这种埋怨是没有理由的。过去数年内，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对我们的，难道艾德礼先生也忘记了？被击沉不久的重庆号重巡洋舰是什么国家赠给国民党的，艾德礼先生难道也不知道吗？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中央军委关于高级领导机关 对下级应加强文电指示等问题 给华东局等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

华东局，总前委，并告粟张、刘张李^{〔1〕}，并告各局、各委：

(一) 艳酉电悉。处置甚好。

(二) 南京电报局不得中央同意，擅自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是何人处理的，望即查明电复。

(三) 我们认为，南京、上海两处暂时均不要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南京方面应重新开放，让外国记者发电，并且不要检查。待他们发一个时期，看其情况如何，再由中央决定或全部停止外国记者发电，或准许好记者发电，停止坏记者发电。

(四) 关于政策及工作方法的指示，在你们高级领导机关方面来说，主要地是依靠写电报，发通令，而不是依靠开干部会，不是依靠口讲。一个负责人半小时可以写一个电报，一小时可以写一个通令，一天、两天、三天或四天工夫可以经过电台传达到各军、各师、各团，各省、各市、各县，有文字为凭，有范围可守，又迅速，又使下级有所遵循。此种方法，毛主席已多次向饶漱石同志提议过。而在你们方面，则对于若干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项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方法问题，仍然不是靠文字，而是靠口头去向下面作指示。口头指示也是要有的，也是有用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则无文字可凭；二则范围不见得很明确；三则到会的少数人听到了，没有到会的多数人没有听到，有挂一漏万的缺点（只是说的只有口头报告，没有文字决议的干部会）。此次外交政策几天时间内出了很多乱子，就是因为你们过去对于这个问题对下面没有任何文电指示。对有些问题有了指示，但如果没有让各军、各师、各团，各省、各市、各县的领导同志同时普遍看到，或者指示中对一项问题不强调，不突出，不鲜明，不确定范围，则各地仍然不明白，或者不甚明白。现在鉴于南京方面闹出的乱子，如果你们还不采取打电报、发通令的方法，立即告诉各军、各师、各团，各省、各市、各县，那就在上海，在杭州，在苏州，在镇江，在无锡，在芜湖，以及在其他地方，又要重复出乱子。这种出乱子的责任，主要地不是在下面，而是在领导方面，事前告诫处理得不适当，或者没有去告诫和处理。过去你们对于山东及苏北的城市政策和工业政策，长期不发电报，不发通令，以致下面无所适从，各干各的，受了损失，也是一项教训。

中央军委

卯三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指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中共中央电贺南京解放

(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诸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诸同志，两大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其他各野战军地方军及南方各游击部队全体同志们，全国工农商学各界同胞们：

我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执行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奋勇前进，横渡长江，敌军望风披靡，南京迅获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此皆我前线将士英勇善战，后方军民努力支援，江南民众奋起协助，其他野战军地方军一致配合行动所获的结果。当此伟大节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纠合一切黑暗势力，建立以南京为中心的反民族反人民的血腥的统治，业已二十二年。全国人民，痛心疾首起而反抗者，先后不绝。国民党反动派恶贯满盈，既发动反革命内战于前，又拒绝和平协定于后，自以为长江天堑可以限制人民解放军前进。不意人民解放军渡江三日，南京反革命中心即告覆亡，安庆、芜湖、镇江、无锡、苏州诸名城，相继光复，国民党军第四军、第二十军、第二十八军、第四十五军、第五十一军、第六十六军、第八十八军、第九十九军全部、第二十

一军大部、第四十六军、第五十四军、第九十六军各一部，被我聚歼于长江以南，常熟、苏州、长兴、广德、泾县、彭泽之线以北地区，并占领上述地区各县。现在整个形势对于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极为有利，尚望前线将士继续攻进，后方人民努力生产，各界同胞齐起协力，共同为消灭反革命残余力量，解放全国人民，建立统一的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
刊印。

在天津市工商业家 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日)

刘 少 奇

各位先生的意见很好。总起来说，不外是这么几个问题：进出口政策，税收政策，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我这次不能多谈，以后黄敬市长可以多谈。

政府的方针很明确。现在整个形势是这样的：反对帝国主义是很清楚的了。我们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要开多少，关多少，都由自己决定。这件事，我们的祖宗几百年来经过多少次流血斗争，都没有做到，今天我们一定要做到，也可以做到。只要把钥匙拿到自己手里，开关如意，中国工业就有了大保障。虽然现在整个国民经济还不能完全独立，还有许多原料零件等等，需要依靠外国，但是因为钥匙在手，只要有十几年时间，国内经济就可以逐渐独立。其次，封建势力由于土地问题的解决，也可以消灭；官僚资本主义，在军事发展下，也可以解决。因此目前的主要问题，便是恢复与发展生产。政府的方针，就是改善与发展生产，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富强。所谓生产，无非是指工业农业。一方面是生产，一方面要有分配。因此，商业，进出口贸易，内地贸易，运输业等，都要和生产配合。

恢复与发展生产，除了国家的以外，还有私人的。在工业方面，一部分是国家资本，绝大部分是私人资本；至于农业，则全部是私人的。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中，近代化的工业生产只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是落后的农业和小手工业。在百分之十的工业中，一部分是国营的，一部分是私营的。将来还可以组织一部分合作社经济。国营和私营企业之间，可能会有竞争，有矛盾，但是政府的方针，是要使国营私营互相合作配合，减少竞争。政府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这就是公私兼顾。也许私营生产会超过公营的，但政府并不怕。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生产，并不反对哪样生产发展得多。重要的是配合问题。前次我和几位先生谈话，谈到怎样使公私营企业结合起来的问题。有位先生说，你订一个计划，我们私营企业来帮你的忙。这意见很好。公私合作有全面的，有长期的，也有暂时的。我们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私人 and 公家的长期合作。你有困难我帮助解决，我有困难你帮助解决，互相照顾。不是尔虞我诈，而是完全合作，彼此有益。我们希望合作得多，合作得长，使公私两利。不过这种合作是完全自由的，并不强制。

上次谈话，有些先生说怕我们的贸易公司，说国家贸易公司是个大资本家，谁能和它竞争呢？这也未可厚非。这就是自由竞争！是学你们的么？统制原料、市场，是普遍生意人的办法，如果国家贸易公司也用这种办法来经营，只顾到自己，那就是不对的，是违反党的政策的。上回李烛尘先生谈到他去山东临清销盐，说临清贸易公司降低盐价挤他。我已告诉临清贸易公司不要这样做，并且要李先生再去。我主张采取这样的方针，就是：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就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

不过这应是双方的，不但我们的贸易公司要公私兼顾，你们也要公私兼顾，顾到国家经济，顾到国家贸易公司的利润。你要不照顾它，它便不会照顾你。又有人说，我们现在只能在国营工业的空子里，吃点残羹余汤。其实不然。今天，中国的工业还不很发展，国营企业还只是些点点滴滴，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大，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我们也主张对私人资本有所限制，但是今天有好些地方，说限制等于不限制。比如铁路、航空，中国今天还没有那么一个资本家说，也要开办铁路、航空，来和国营的竞争。将来限制恐怕要多一点，如工厂愈办愈多，中国已不是产业落后，而已达到进步、饱和了；生产不是太少，而是过剩了，那时就必须限制。不然，中国就要变成帝国主义，到国际上去抢市场，一抢就要打仗。要是那样的话，今天的政策便是失败的。不变成工业国不得了，一变成那样的工业国更不得了。这些事情还远得很，但今天我们就可以有计划地避免，这一点政府可以做。比如办多少纱厂以后，不要了，可以限制国家和私人再办。我们的政策是走新民主主义道路，不是走旧资本主义道路。要采取限制政策，就是为了避免旧资本主义的前途。公私兼顾就是一种限制，没有限制，哪能兼顾？像李烛尘先生所提的，临清贸易公司应提高盐价，这就是要限制贸易自由；限制临清国营贸易公司有减低盐价的自由。劳资两利也是一个限制政策，如果只利资方不利劳方，是对资方没有限制。又比如税收问题，你们提议将税率由百分之三减少到百分之一点五，是说税收限制了你们发展，因此你们提议要我们把税收限制一下，这也是相互的。在城乡关系上，现在工业品太贵，农业品太贱，这对农民不利，应该互相照顾，互相合作，所以也要有所限制。

关于几个具体问题：

对外贸易问题。你们提的意见很好，可以由对外贸易处与有关方面商量，想办法解决。统销如果妨碍出口，可以修改。修改方法不一定是取消已颁布的统销法令。你们经营出口，可以在互利的条件下与政府商量获得适当解决。

贷款方面也要互相商量。恢复工业需要一大批资金，光是公营厂房修补一下，就需要十五亿人民券。但是贷款仍需要办，应该统一筹划，公私兼顾，大家分一点。要全部够用，我想是不可能的。加发票子，如果不致影响生产，可以发。贷款的章程可以具体研究一下，如临时贷几批，立即生产见效，就应立即做。

税收问题。天津税收现仍用旧税率。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经验，石家庄解放后半年多不收税，反而引起工商业家恐慌，以为要清算他们，不但不感谢，而且还不放心。所以在天津解放前，我们就打电报通知，天津一解放就照国民党的办法收税（苛捐杂税除外），收几个月后再慢慢改。收的结果不坏，出我意外。据你们说税收得多了。你们既然可以照数交给国民党，为什么不能同样交我们呢？你们拥护人民政府么！我们以后可以在财政上公开，采取老实态度，收多了告诉你们，有困难要求你们解决。同样，你们也应该采取老实态度，调皮捣蛋，尔虞我诈，大家反对。过去在国民党下面，老实吃不开，现在在人民政府下面，只有采取老实态度才吃得开。国民党收税时贪污很厉害，你们用的是两本账，所以实际收得少。这次税收得多，我们有一半功劳，因为我们不贪污；你们也有一半功劳，因为两本账变为一本账。这样，中国就有救，有前途。

税收多了，要做点事。要把工厂玻璃安起来，用两个月的盈余来开支就够了。其次，还有很多事业要办，如医院等的

建设。

税收重了，可以修改得合理一些。一种商品抽好几种税，是妨害生产的。怎样修改？请你们提意见，提出一个新的税率表，由税务局组织一个会，大家商量。但大家应该负责任地提意见，要公私兼顾。职工所得税也得和他们商量。

你们现在觉得负担很重，我可以把公家的情况告诉你们。国家经费是困难的，原因是打仗。这次天津战役，单八二迫击炮弹打了十万发，一颗炮弹等于一个中农一年生产的总收入。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又过了长江，有二百一十万战士同时在前线作战，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大的兵力。但是在全世界我们的兵的费用还是最便宜的（美国兵每人每年要用一万七千元美金，而我们的兵一年仅用一百多不到二百白洋）。政府财政这样困难，负担最重的是农民，他们又要出公粮，又要当兵，又要当伕子，支援前线，优抗代耕，出教育费等等。你们负担比农民轻，所以他们抱怨工人、商人、资本家吃得好，穿得好，怨声很普遍。这点请你们也要顾及到。城市负担多一点，可以说服农民。我主张把这次的征额在报纸上公布，使农民知道城市里的人也负担了一些。

不过，这样的时期是不会很长的。大家咬紧牙关，过一年或者两年，炮弹不打了，兵不养这么多了，有的兵参加生产事业了，情况就会改变，现在需要你们多负担一点，税收恐怕还要增加一些，当然，如果多到妨碍生产的程度则应当减少点。处在今天困难的情形下，工厂能够不断生产，不赔本，就算是胜利了。国营企业中甚至有的还蚀本，也要继续开下去，用赚钱的厂贴赔钱的厂。今天工业的利润不可能很多，但工业的前途很光明。眼光要放远一些，赚大钱的时候在后头。

你们有些困难，像原料不足等问题，可以向政府声明，政

府能办到的，一定尽量帮助。比如你们想到山东，河南去收买牛皮，政府给予帮助，完全没有困难，有些问题，我们不了解，就希望你们提意见，和我们合作。上次有人提议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很好。将来我们要建立人民代表会制度，但是目前人民还没有组织起来，还不宜于建立。在这过渡时期里，我想，不妨在华北成立一个经济委员会，下面分几个部门，如税收、原料、贷款等等，看需要来设立；产业界人士、工程师和专家都可以参加，一切问题和意见，可以向这个委员会集中。

对外通邮电的问题，可以商量。和外国通邮电，只要在不丧失国家主权的条件下，可以经过外商与外国建立关系，这是临时办法，不是永久的。和帝国主义来往，只要不丧失主权，不致束缚我们的手脚是可以的，和外国人做生意有好处就做（他也愿意，两利）。这是讲生意。政治问题是另外一回事，诸位可以不谈。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今天帝国主义来找我们，这口气我们不能忘记，就是说，不要忘记民族立场，但是有好生意还是照做。

商标假冒，是不好的。

公司法请你们起草，可用的话就颁布（是临时的）。是不是要限制股息呢？李烛尘先生主张要限制，以利润的三分之一给工人，三分之一作公积金，三分之一作股息。我觉得顶好现在不加限制，股息的提高或降低，要看对什么有利。只要钱拿到工业上去，拿出来流通，总比埋在地下好。据说现在投机利润最多，其次是商业利润，最低的是工业利润。我主张压低投机利润（投机家破产最好），减低商业利润，提高工业利润，七八年内不要限制，对国家、对工人、对生产都有利。到底赚多少才算合法？我以为赚多少钱都合法！

私人房产问题。听说现在有的房主不修房子，怕分。我们

的方针是，除了官僚资产阶级的房子必须没收外，其他一律不没收，而且保证私人产权，鼓励出租。政府不号召搞减租运动，而号召交租。房租由双方议定，有纠纷时再由政府调解。有钱可投资于房产。至于地皮问题是另一件事，现在不作宣布，恐怕将来要归国有。地皮是国有，房产是私有。将来要盖房子、盖工厂，可以向国家领地皮，不必花钱买，只由国家收一点地皮税、房产税。好的地段多收点，差的少收点。房子垮了，地皮仍归国有。不过将来建筑房子要有规格，不能随便盖。

最后一个重要问题是劳资关系问题。我们的政策是劳资两利。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要贯彻这个政策的，是要真正做到劳资两利的。在执行的初期，不管发生多少偏差和错误，最后是一定要贯彻的。因为不这样，要想把农业国家变为工业国家就不可能。大家要从根本上了解这个政策，平日就不至于为一时的或个别的现象所迷惑。

有人很不愿意听“资本家”这个称号，很怕听“剥削”这个词。这些不是原则问题，如果你们谁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出另外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仍旧叫你们“资本家”。资本家和工人是两个阶级。马克思和列宁都说过，这两个阶级要在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个别问题的调和或在某些问题上的调和是可能的。这一矛盾的根本解决，就只有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革命。这是规律，不是谁可以制造的。我们把这个道理来和中国的实际结合一下：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经过革命，你们看现在和国民党的斗争，就是严重的流血斗争。但是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和平地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起就搞，就是实行

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到那时候，私人资本的积极作用已经用完了。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那时的前途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帝国主义的路，一条是社会主义的路。那么你们要选哪一条路呢？还有没有第三条路呢？如果有人说还有第三条路，如果他能说服我们，也行。不过一百多年前，在世界上像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大学问家，终生就在研究这个问题，我研究这一个问题也有二三十年，如果说你们在办工厂方面是专家，那么我在这一方面倒也是专家。我们认为非走社会主义的路不可。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不要以为它好得很，其实是苦得很，它在闹生产过剩，闹经济危机，要到国外去抢人家的市场，国内外人民都在反对它。生产过剩就要到外国去抢市场，就要打仗。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第二次大战也是这样打起来的，杀了几千万人，就是因为这个。这不是哪个人愿意不愿意打的问题。这是走帝国主义这条路，使得他们一定要这样做，非打不行！好像国民党在和我们打仗中的命运一样，宋子文说：和也是失败，打也是失败，与其和而失败，不如打，还有个生存的可能。总之失败是注定了的。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失败是已经成为前提了，于是就非打不可，所以他们苦得很。但我们就不然，我们好得很！今天解放了平津，明天又解放了南京上海，我们高兴得很！现在，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当中，你们这些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怎么办呢？上次我对宋棐卿先生（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说：你现在才只办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

后，国家把这八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子，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呢？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开眼笑地来开会。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矛盾，今天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求得解决的，只能设法缓和一下。听说工人已经向你们提出许多要求，这就是在向你们作斗争，你们很难办，于是来找政府解决。这是事实，我们得承认这个事实。有些工人的要求是过高的了，如要求工资增加一倍、两倍到好几倍，使得资本家受不了；有些要求是不正当的，如要求分工厂分店铺；有些行动是不妥当的，如刚才有的先生所说的，工人不守厂规，不听指挥，不到时间就自己下了工等。这些事情，叫过分、过左，是部分的，不是全面的。有些事实我们已设法纠正。这是两个阶级在斗争，现在工人在斗你们，可是我要说明一点，这种斗争是由两方面斗起来的，单是一方面是斗不起来的，而且一般地都是你们先斗。世界上向来就是如此，总是资产阶级先斗的，因为资产阶级先是处在优势，然后工人又反过来斗资产阶级，最后总是推翻资产阶级。听说过去有些厂里，资本家打人骂人，还有强奸的，这就是阶级斗争的行为。今天解放了，工人有了共产党，神气十足，于是就有了过分的要求。

今天我们有三个敌人，四个朋友。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我在工人代表会上，号召工人分清敌友，如果反对资本家，那便搞错了。要联合资本家使生产发展起来。但除了联合以外，对资本家还须作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只有联合没有斗争，是不合事实的。我不但鼓励工人这样做，而且也

叫你们资本家向工人作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因为斗争是自然的，客观的，两个对立的阶级，必须经过必要的斗争才能两利。政府拟定了一个劳资纠纷的处理办法，等大家讨论同意后，再作为正式法令颁布。但光靠那个办法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你们必须和工人斗争，如果不斗，将来你的厂子被工人斗垮了台，那时你就不能怪共产党不好。玩花头是不行的，如某工厂为工人要求五一节发衣服的事，想在工会、政府口中讨一句话来作资本，去挑拨工人和工会、政府、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这样做是不合道德也不大合法的；反之，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进行适当、必要的斗争，倒是被允许的、合法的。此外，在劳资斗争中，不要去收买工人、工会、共产党员，不要故意拉这个打击那个，结果使工人对你们印象很不好。这样做可能引起工人内部一时的不团结，但明天他们会搞到一起的。用这些办法最后是会弄得工人不信任你们的。

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尽管工厂有几千几百个股东，但你是代表股东、代表资方在工人身上剥削剩余价值的，一块钱也是剥削。有这个事实，只好承认。但是，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苦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大家赞成。你们当前与工人有很多共同利益。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说过，近一百年中，资本主义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轻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应

赶紧努力，不要错过。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愈多愈好。股息应该提高，如果工人工资过高，你们自己可以提出来

李烛尘先生提到办合作工厂问题，我赞成，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不准外股参加。二是从经理到工人，股息要平均。否则，不能称为合作工厂。

雇请工人和辞退工人，你们有权，但必须是为了生产上的需要，如果是挟嫌借故裁撤工人，只留下你的亲戚朋友，而他在生产中作用又不大，那就不允许，工人就要斗你。听说私营工厂也有官僚化，也需要和国营工厂一样整顿一下。工厂办得好，才能说服工人，才能站在有利的地位与工人进行适当、必要的斗争。

工人起来了，话说得不好听是有的，于是你们便觉得面子上过不去，觉得“士可杀不可辱”。自然，工人不守厂规是不对的，我们已告诉他们要遵守，你们也可以按厂规处罚。同时，你们又需要在劳资两利和尊重工人人格的原则下，修改一下旧厂规，交给工会和工人讨论，他们同意后交政府批准。如果有的条文工人不同意，双方无法妥协，就交总工会、政府加以判断。条文成立以后，双方都要遵守。

资本家与工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工人对厂长职员轻视他们不满意。一般知识分子常看不起体力劳动者，认为自己有身份，工农没有身份。这和民主精神是不合的。“士可杀不可辱”是对敌人而言，但在中国人民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身份。知识分子常自高自大，耍架子，凭架子吓人。现在，你们应该放下架子，把工作服穿起来，和工人一样。职务可以有区别，人格却没有高低，除了在职权上可以指挥工人外，其他问题上，你只能以朋友的关系去建议。在美国工厂里职员和工人的外表没有什么区别，这很好，这就是放下架子。高人一等的等级思

想是贵族思想、封建思想，不是资本主义思想。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就是人格平等。像美国总统罗斯福说的：“在汽车上，我就听汽车伙指挥”。又像北平大华窑业公司经理陈荫堂的表现，便都是尊重工人人格。这样做，可以使劳资关系更好一些，矛盾、斗争更少些。我们的军队里官与兵分不出来，大家共甘苦。我们在这里的上下干部之间为什么不闹事呢？也是因为能共甘苦。

以前的社会风气，是有身份、有架子的人才能吃得开，这是社会罪恶。如果说剥削是罪恶，也怪不了哪一个人。过去你们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剥削，一方面又剥削了别人，这是剥削社会的罪恶。我们现在要改的是社会制度，并不是对哪一个人有仇恨，说放下架子也是一样。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本家互相尊重，各得其所。这样，社会秩序就可以安定，大家就好努力地进行建设工作。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刊印。

中共中央对华东局 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 会师的工作指示的批示

(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

华东局，并告中原局，林罗^{〔1〕}：

你们“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草案，已阅悉。写的很好，我们完全同意。并认为要特别注意教育野战军的与随军南下的干部，认识到游击区的党与游击部队的缺点，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他们长期在敌后作战，得不到中央经常具体的领导，中央的许多文件也很少看到，学习的机会也少等等。这样来看问题是合乎事实的，也能使游击区的党与游击部队的干部更愉快地自觉地检讨其自己的缺点；另一方面，也就能使野战军的与随军南下的干部对当地坚持游击战争的干部少作求全的责备，这样就有助于双方的团结。这是一个外来与本地的关系问题，也是野战军和南下干部如何与当地群众结合的问题，从接触的一开始，特别是外来干部就必须自觉地深刻注意这一点。

中 央

辰支

附：华东局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 会师的工作指示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

现在南方苏、浙、皖、闽、赣、闽东等省，均散布有我党领导的游击区和小部队，或系苏维埃时期留殖下来的，如浙南、闽西等地，或系抗战期间留殖下来的，如皖南、浙东、苏南等地。我军渡江后，即开始与各游击区汇合，双方会师，是在南方广大人民多年渴望与瞩目之下进行的，是关系我党我军与南方老苏区老游击区广大人民的政治联系的根本政策问题，是关系我党我军在解放南方各省时的统一政策，统一行动的重大关节问题。目前我们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情况尚不完全了解，特预先指出下列各点，以引起各游击区各部队和南下干部的注意，在思想上工作上有所准备，以便会师时造成有力的团结，去完成解放南方各省的任务。

（一）首先是人民解放军的各级党委的南下地方干部和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应认识南方各游击区各小部队，他们在多年游击战争中所创造的地方，所获得的成就，是最可宝贵的。例如：保持党在南方的革命旗帜，保持党的组织和干部，保持了精干的游击武装，与当地人民在斗争中建立了很好的联系，有力的配合了北方的人民解放战争，这些方面均值得南下同志的重视和虚心学习的。特别他们在长期奋斗中与当地人民建立了斗争联系，对于执行我党解放南方各省的任务，可起重大的骨干作用。此一点，要有深刻的认识。我军初到南方，情形不熟悉，必须懂得充分利用我党在南方各游击区这一有利条件，在

各游击区影响所及的地方，必须经过他们作为联系群众的桥梁，应该以我们在北方遇事尊重地方党，重视本地干部的整风态度去对待他们，去造成双方的团结。切戒自高自大，只重视自己的经验，不重视别人的经验，不经过游击队的党去直接处理与当地有关的问题。我们南方游击区的党和部队，在数量上可能很少，形式上可能极不完备，地区也不宽广，供应部队的的能力可能很小，他们多年与上级党隔断，对我党现行政策不能完全明了，在敌长期封锁与“清剿”之中，必然要产生各种缺点。我们南下的同志和主力部队，应该以虚心体贴的态度，加以慎重分析，作各种有益的帮助，如果采取轻视或粗鲁的态度，必犯脱离当地群众的严重错误。帮助当地群众培养当地干部，提拔当地干部，壮大游击队，变民变的游击区为广大的解放区，是我军南下的基本任务。对游击区与游击队的工作配合问题，处理得是否适当，对培养当地干部与壮大当地部队的任务完成得好不好，这是检验我各党委工作的基本尺度之一。

（二）南方各游击区的党和游击部队的同志，应向自己区域党内同志和当地人民有系统地说明目前政治形势和大军南进的意义，号召当地人民有力的执行配合任务，去实现南方各省的彻底解放。应该了解解放军与一批地方干部从北方来，多年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对党的政策比较了解，对解放区的比较有经验^[2]，因此在一般政策上，游击区的党应服从部队的党的领导，和多倾听南下同志的意见。游击部队在行动上应接受主力部队的指挥，更应了解我游击区，党和游击部队，自己在多年坚持游击战争中，除有其光荣的成绩外，还不可避免的在独立斗争中，带来各种缺点，自己面临中国革命全胜的新时期，自己应重新检讨自己，适当的改变自己，方能适应新形势和执行新任务，就是在长期斗争中被检验过的认为正确的部

分，亦应根据新的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作必要的正确的改进，才能适合人民的要求，对当前任务作有力的贡献。在此，各游击区的党应与部队的党于会师后，进行互相会报情况协商政策，并首先办训练班，将游击区党和干部进行短期轮训，研究中央文件，造成共同认识。同时游击区同志对人民解放军和南下地方工作同志的要求不可过高，他们数十万人中，每个人对党的政策了解程度是参差不齐的，每个人的政治觉悟程度也是参差不齐的，尤其情况生疏，斗争形势复杂，部队庞大，各种条件不具备，难免不产生各种毛病，我游击区的党要能正确分析这些现象的来源，站在党的正确立场给以必要的帮助。

（三）估计到大军南进后，敌人尚未完全消灭，斗争形势尚极其复杂，庞大部队的供应极其繁杂，地方党政的系统未完全建立，群众的发动尚在初期，我党对各阶级的社会政策，只有原则的决定，其具体执行办法则应根据各地实况去考虑订定。尤其在当地，谁是反动分子，谁是恶霸分子，谁应先办，谁应缓办，谁应宽大改造，谁应立即惩办等问题，在这些方面可能引起部队与地方、外来与本地的不一致，尤其是部队的庞大供应，容易产生制度不周、纪律不严的种种毛病。遇着此类关系双方团结必须求得一致的问题，应该掌握自我批评的武器，在一定组织内经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手续去求得解决，不可意气用事，盲目冲动，损害团结。在处理原则上，双方分清优点与缺点、有意与无意、个人与组织、少数与多数、个别与全体、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界限，从赞扬成绩去帮助改正缺点，从互通情报造成共同意志，经过对方直属上级去纠正缺点与错误，而避免越权的直接处理。既不可对双方错误采取消极指责的轻率态度，亦不可采取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态度。在此，我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的党，自己站在领导地位，尤应以自我批

评的态度，主动的去团结当地党和当地同志，从军事会师进到思想会师，以至政策会师，对于团结全党去完成解放南方各省的任务是有其直接意义的。

此指示先发部队党和南下干部研究，在会师时由部队转发各游击区的党。

华 东 局

卯东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1〕指林彪、罗荣桓。

〔2〕原文如此，应有缺字。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的青年运动 与今后中国青年的基本任务^{*}

(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

廖 承 志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宣告灭亡，人民民主革命已在全国取得决定性胜利，在五四运动的三十周年和北平解放以后的第一次五四纪念的时候，我们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了。

这次出席大会的代表，包括着全国各个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政治信仰、不同宗教信仰的青年及青年工作者，这是全国青年的民主大团结。召开具有这样广泛代表性的全国青年的大会，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这是中国青年久已盼待的集会，它的实现应当归功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改变了全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青年生活的面貌。中国青年可以自慰的是：在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胜利进军中，中国青年保持并发扬了五四以来中国青年的光荣革命传统，英勇积极地参加了这一伟大的解放斗争，并且成为中国革命大军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军。

* 这是廖承志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解放军中的青年战士，约占全体解放军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他们在战斗中创造了成千成万的模范射击手，模范炮手，坦克手，爆炸英雄，战斗英雄。他们在各种军事、政治与技术学习上，在部队的民主生活和文娱活动及其他各种建设性的运动中，经常是最活动的分子。

解放区的青年农民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他们积极地参加了解放区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已成为区村人民政权的干部，而且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来源，和民兵、自卫队和支援前线的民工的主力。

青年工人的数量，在全体工人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中国生产战线和政治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他们在大规模解放战争的供给和广大人民的需要上，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作了很重要的贡献。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职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中国学生运动有光荣的历史传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进行着英勇斗争的学生爱国运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尊敬。而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学生处境相反的学生们，是生活和学习在完全自由和进步的政治环境中，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大量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干部。

除了上述年青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英勇奋斗以外，还有文化界、教育界、自由职业者等其他广大阶层的爱国青年及青年工作者，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底下，在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了反对卖国、独裁、内战，拥护独立、民主、和平的庄严工作，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

由此可见，在过去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中国青年是努力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的。现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正在接近于

最后的完成，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正在开始，希望全国青年发扬过去的英勇牺牲艰苦奋斗的传统，来执行以下三项基本任务：

一、拥护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完成， 拥护人民民主的新国家

现在南京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土崩瓦解，但是还有残余势力需要肃清，这些反动残余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之下，还企图死灰复燃，继续祸害人民。中国青年应当和中国人民在一起，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民主党派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正确方针，继续积极参加和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残余敌人，解放中国的全部国土，使全国人民和青年无例外地都能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面解放出来。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解放区的青年需要大量参加和支援南下的人民解放军，并积极参加和协助新区接管工作。暂时还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青年，则须积极团结群众，努力保护经济文化机关及一切资财勿受破坏，准备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中国青年一方面需要积极参加消灭反动派残余的斗争，另一方面需要积极参加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为了建设新中国，应当在青年中间普遍地提倡新的爱国主义。在解放战争的烽火中诞生的伟大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和无数革命先烈的英勇流血造成的。我们的国家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九百六十万方公里土地，有四千年的文明历史，它现在已经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束缚，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保证了社会生产力的日益提高和青年后代更幸福的将来，因而成为世界上少数最进

步的国家之一。中国青年必须以无限忠诚，热爱这个可爱的祖国，积极献身于我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建设，积极加强和改善我国人民的权利和地位，巩固我国的国防，保证我国的领土、主权、利益、荣誉的神圣不可侵犯，爱护我们国家的一切公共财富，尊重和遵守人民政府所制定的革命秩序和法律制度，向危害我们国家的生存和利益的一切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借以保障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的蒸蒸日上。

中国青年的这种爱国主义，是与进步人类的国际主义相一致，而与民族侵略主义和排外主义不相容的。我们深信一切民族都应有独立自由的平等权利，各国人民都应当互相尊重，互相团结，反对民族间的侵略、压迫和歧视。因此，我们不但关心自己祖国的命运，而且关心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革命运动，关心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民主运动。我们中国青年要积极参加世界青年和世界人民反对新战争阴谋、反对民族侵略、反对反民主政治的共同斗争。

二、加强生产建设工作

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日益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的重要任务。中国青年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伟大工作当中负有严重的责任，正像过去在革命战争中负有严重的责任一样。

一切参加国营工业或其他生产事业的青年工人、职员和技术人员都要树立正确的劳动态度，加强劳动纪律，改进生产技术预生产管理，充分发挥青年在生产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便达到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改进产品质量、减低生产成本、加速产品流通之目的。在有益国民生计的私营工业或其他私营生

产事业中劳动的青年，也要在自己的正当权利获得保障的条件之下，积极增进生产。

从事农业劳动的青年，要提倡根据自愿两利原则的劳动互助组织，发展供销合作社，改进农作法，努力增产粮食、棉花和其他农产品。而在没有完成土地改革的地方，还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积极参加土地改革的斗争。

总之，青年无论在什么生产岗位上都要采取积极态度，向着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方向努力。青年应当提倡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作风，节衣缩食，以便积累经济建设的所必须的资本。

三、学习新民主主义、学习科学和文化

青年的基本任务是学习。中国的一切爱国青年，今天处在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时代，处在全中国人民着手大规模地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时代，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必须努力学习。首先是学习我们新中国立国原理的新民主主义，学习科学和文化。

中国一切爱国青年都应当学习新民主主义，因为这是我们新中国的立国原理。中国的一切爱国青年都应当努力学习新中国的创造者和领袖毛泽东，学习毛泽东的忠于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原则精神，学习毛泽东的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学习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我们在学习问题上，在思想的问题上，应当建立和在政治上同样的统一战线，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下的统一战线。

中国青年除了学习政治以外，为了建设繁荣的富强的新中国，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具有必要的生产知识，并且必须努力钻研现代的科学知识，使这种科学知识服务于中国的生产建设，以便培养自己成为建设工作所需要的各种专门家。

由于过去旧中国的文化教育不发达，提高全国青年的文化水平，首先必须广泛展开青年的普及教育运动，争取在一定时期内消灭文盲，普遍地提高青年的文化程度。对于那些在穷乡僻壤埋头苦干，培育国民后代的广大农村小学教师的艰苦工作，我们更应给出最大的尊重和帮助。

同志们，为了实现上述任务，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全国青年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奋斗前进。

如果没有全国青年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共同纲领下，不分职业、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不分政治信仰、不分宗教信仰的一致团结，那么中国青年的力量就将受到分散和削弱。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那么中国青年就可能在前进的路途中迷失方向。

在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中，已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这正是我们大家所希望的具体实现了全国青年民主大团结的一个全国性的青年组织。我们相信：它将能够广泛团结全中国青年和全世界的一切民主青年，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为全世界的和平民主运动竭尽最大的贡献。

根据一九四九年六月六日《人民日报》
刊印。

中央军委关于城市驻军 不许住民房的规定^{*}

(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

各中央局，分局，总前委，前委，平津两市委：

(一) 平津的经验证明，在城市特别是较大城市的解放初期，卫戍部队分散在城内驻扎，确实是必要的。这更便于保障社会治安与秩序，肃清流散的残余的敌人，镇压反革命的特务活动。因之，在入城初期，不能要求卫戍部队只集中驻在郊区少数的几个兵营中。

(二) 但是，另一方面，平津的经验又证明，军队在城市中借住民房是十分不妥当的，因城市不同于乡村，虽然我们部队的群众纪律，一般是很好的，也给了平津人民以良好的政治影响，但借住民房终给居民以诸多不利不便之处。譬如，城市里的房租，在房主的收入中和承租户的支出中都占有相当重的位置，部队借住了，或者是使房主减少了收入（这对小房产所有者是很大的损失），或者是使承租户缴纳了无名的负担。水电费的纠纷，也很难处理。门口设置岗哨，在部队是必须的，却因而使房东的亲友探望甚至不经常在家住宿的家属之来往遭受到留难。再如，屋壁上楔钉子，院子里牵绳子，也常使房东

* 这个通知经周恩来修改后发出。

不满，每日清晨的起床号，更与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相径庭。又如，城市人民的生活一般是较高的，而战士看见房东吃鱼肉，吃零食，就不免当面表示惊讶或背后谈论，于是有的房东就反映一饮一食在精神上也感受威胁。还有的因对房东雇用的男女仆人进行阶级教育，而使房东惴惴不安，平津已有人函劝在上海的亲友解雇仆人，凡此种种，并不能怪部队纪律不好，而是由于城市的特点造成的，这证明部队在城市中借住或租住民房是十分不妥当的。

（三）因此，中央决定：

（甲）在城市解放初期，卫戍部队应适当分散在市内驻扎，但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而应驻扎在中外兵营（帝国主义武装尚未撤退的兵营，另案办理），公共机关（机关应尽可能挤出房屋让部队住），庙宇，祠堂，公所及会馆等公共场所中，业已停课之学校亦可驻扎，必要时宁可以适当的代价租住整栋的旅馆，也不要租住民房。这样，在大中城市中，市区驻军的营房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且，还可以做到以营或一两个连为单位分散驻扎，更便于管理教育，遇事也便于集中调度，较之因借住民房而不得不以班排为单位要好得多。至于小城市，公共场所虽然不多，但小城市的市内驻军也不必多，也不必如何分散，不住民房还是可以办到的。

（乙）城市解放后，至少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不要接家眷来城居住。否则，势必借住或租住民房或占用公共房屋，设置私人公馆，私人占用汽车、占用家具者也势必增多，警卫增加困难，并将给人民以不良的影响。中央去年亥哥《关于城市中公共房产问题的决定》中，“非经中央或中央代表机关特许不得设立私人公馆”，“严格禁止一切霸占，争夺、移走、拆毁公共房产、家具、设备的行为”，“禁止任何私人霸占汽车”，及

“不容许有不守纪律及贪污和腐化的现象”等规定，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丙）解放军入城，群众的欢迎慰劳是应该的，可以有计划地组织若干次戏剧、电影以慰劳军队，必要的宴会也可以举行，但不得过事铺张，不要搞什么特殊规定。如规定澡堂、理发店、剧团、电影院开放若干天，免费慰劳解放军，以及半价优待等办法，都是不对的，实际违背了本军买卖公平的守则。又如北平解放后三个月内，请客太多，堂会数十次，则不仅浪费甚巨，也的确给人民以不良影响。群众反映说：“解放军真是好看戏！”这一现象，不应再在别地重复。

（四）平津两市驻军，除留防之少数卫戍部队外，现均已南开，应即进行一次普遍的群众纪律的检查，一方面向群众解释部队不得不分散驻扎的原因及分散驻扎对保护治安之实际效果，另一方面赔偿房东的损失（如有损失而部队并未赔偿者），代缴部队所欠房租，对于房东所受的一些干扰尽量予以解释和道歉。这一工作，应由军管会或市政府会同部队政治部，根据部队住用民房的调查登记簿，而逐街逐户去进行，如部队政治机关已随军南下，无人办理，则由军管会和市政府与华北军区政治部负责，务使由于部队住用民房而在人民群众中留下的不良影响完全挽回过来。现时留在平津之卫戍部队，则应立即依照三项甲目规定，重行调整驻屋，并由华北军区以调整结果报告中央军委。

中央军委

辰鱼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军委关于占领奉化时 不要破坏蒋介石住宅等问题 给粟裕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

粟张（转谭王吉），并告陈饶，刘邓^{〔1〕}：

（一）陈饶微电悉。

（二）请粟、张即行部署于辰灰以后、辰删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逃走（据上海吴文义几次报告，汤恩伯正在运走物资），并迫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请粟张以具体部署电告。

（三）为着占领吴淞，对于昆山、太仓、宝山三城，恐不能不去占领。但嘉定城及昆山城以东之陆家浜、安亭等处，如果可以不占，则暂时不要去占。

（四）在占领嘉兴以后，应继续占领嘉善、金山、平湖、乍浦、金山卫诸点，但青浦、松江、奉贤等地，暂时不要去占。

（五）此外，谭王吉集团在杭州地区休息数日后，应派一个军至两个军迅速向东，占领杭州、宁波一线及该线以南之奉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化、嵊县、新昌、诸暨、义乌等县，然后展开工作。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或者减少他们的捣乱行为。

（六）占领吴淞、嘉兴，并不放弃推迟占领上海的计划。何时占领上海，仍须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来作决定，最好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充分完成准备工作，但是你们仍须准备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早日去占领上海。你们的准备工作愈快愈好。

（七）请粟、张预先告诫部队，在占领吴淞时，极力注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

（八）请刘张李^{〔2〕}注意保护南京的孙中山陵墓，对守陵人员给以照顾。

军 委

辰鱼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指张震，谭启龙、王建安、姬鹏飞，陈毅、饶漱石，刘伯承、邓小平。

〔2〕指张际春、李达。

学习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

周恩来

中国人民的大革命已经走向全国胜利，我们青年要加紧参加建设新中国的事业。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我们这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口号也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我们决心举着这面旗帜前进。在今天这个会上，我想把毛泽东同志如何值得我们尊敬和我们如何向他学习的主要的几点给大家说一说。

学习毛泽东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有极其丰富的内容的。我们青年代表回去，要向全国广大青年——农村、工厂、城市、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宣传我们代表大会的主张，动员和争取千千万万的青年群众跟着我们一道前进。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旗帜就是我们最好的号召。我们号召全国青年跟着这个旗帜走，就必须认识这个旗帜是怎样发展到今天的。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在座的朋友们向全国青年宣传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学习的时候，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

* 这是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三部分的节选。

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因此，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

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你看这样还不够迷信吗？那个课本写毛主席的故事，把事情反过来，说他从小就不迷信，打破迷信，生而知之。毛主席说，这是不合事实的。而且一般地说，在那样的封建社会里，不管农民家庭出身的也好，工人家庭出身的也好，一下打破迷信是不可能的。毛主席生长在十九世纪末的农村里，不可能没有一点迷信。为什么要说明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广大青年队伍中，不要因为有的人还迷信就认为他不可教育，就排斥他。昨天迷信的孩子可以变成今天的毛主席（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成毛主席）。迷信是可以打破的。早两年你还不是迷信！你年轻时还不是有丑鼻涕！不要进步了对小孩时的丑事就不愿正视了。

毛主席常说，他也是读古书的人。读古书看你会读不会读。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五四”那天我看到范文澜同志写的一篇文章

章，说五四运动前后他就专门研究汉学，学习旧的东西。但是当 他一旦脑子通了，对编写中国历史就有帮助，就可以运用自如。所以在我们青年中，也不要因为有一部分人喜欢读旧书、研究旧东西就认为他们不可以进步，不要因为他有旧观念就不去团结他教育他，不要因为他落后一点就不理他。只要他愿意进步，就有改造的可能。毛主席说，他自己就是这样改造过来的。

毛主席还常说，他开始研究东西也是先搞一个方面，没有通就钻进去，先把这方面搞清楚。“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这就说明毛主席当时没有顾到另一方面。但后来毛主席很快就转到乡村，又把农民运动搞通了，使城市和乡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以后又搞军事，都搞通了，并且全面了。这也就告诉我们，有些青年人研究问题还没有进到全面，喜欢专心致志地搞一面，我们不要去打消他的兴趣；即使他不愿参加政治活动，我们也不要排斥他，可以慢慢地教育。

我讲这三个例子是说明：毛主席也是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也曾经迷信过，也曾经读过古书，也曾经研究问题开始只注重一个方面。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我们看到在旧社会里有这样的人，乃至在人民统治的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

险之至。所以对那些有迷信的青年，落后的青年，只认识片面不认识全面的青年，我们不要抛弃他们，要去教育他们。我们青年要互相学习，要让这些人跟着我们学习，同时我们也跟着他们学习。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我们大家要从这方面来看毛主席的历史发展。这样，同志们中有了骄气就可以压下去了。毛主席都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哪一个人没有错误没有缺点？还值得骄傲？比毛主席差得远！

我们要学习毛泽东，还因为他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领袖。中国的革命自从他参加领导以后，方向就一天天地端正起来。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的。开始的时候，党中央也好，一部分革命群众也好，常常自己弄错方向，迷失方向，但是毛主席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大革命时期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但是没有被当时的领导上接受。十年内战时期他是对的，当时也有一些同志搞错了，没有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抗战时期，全党承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抗战成功了。到这次解放战争，更加证明其正确。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他不断地指出真理，坚持真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毛主席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这样指出真理的人，坚持真理的人，发挥真理的人。在中国革命三十年中的许多历史关键时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

毛主席坚持原则之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一、坚持方向；二、实现方向。方向的实现，只有一个人懂或者少数人赞成是不成的，要在群众中实现。要实现原则，就要使它具体

化，使它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多数人都来执行。坚持真理是会遇到困难的。毛主席不仅指出了原则，而且还制定具体的政策、策略来实现这个原则，每个历史时期的政策都是适合这个时期的。这一点，青年们在研究《毛泽东选集》时就可以看到。大革命时期，必须使农民运动深入发展到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说明了这个真理，拥护农民提出的办法，并加以发挥，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的办法。不过当时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没有接受，大革命失败了。内战时期，毛主席提倡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你们去研究毛主席在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今天人民解放军中所实施的政治工作就是从那时一直发展下来的。但是毛主席的主张经过多年才逐步实现，中间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当时大家虽然在形式上接受了，但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真正到实际中具体化了，大家才能懂得它的威力。抗战中要团结蒋介石的政府来抗日，明知道他动摇、消极，但是必须推动他抗日，才能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既要团结他，又要防备他，同他的反动的一面作斗争，所谓“有团结有斗争”。用这样的策略来进行抗战，使人民自己的力量壮大，这就需要说服很多人同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就有一些人说，既然要团结就不要批评。党内也有人有这样的意见。所以要使这个原则真正实施，就要经过许多曲折的斗争。解放战争比较顺利，但也还有小的挫折和错误，譬如土地改革中，也曾发生过“左”的错误，一直等到毛主席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报告出来了才得到全面的纠正。这都说明，一个原则、真理、政策在实际中实施，是要费很大的力量，做许多的具体工作的。毛主席不但能够坚持真理，指示方向，而且还拟定了许多具体政策、策略来贯彻这个真理、原则。不如此就无法使革命达到胜利。所

以毛主席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使它具体化。这样才能有今天的胜利。我们青年人学习毛泽东，不仅要懂得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原则、真理，还要研究他的具体的政策、策略，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深入实际。我们青年人不是要空谈，而是要实行。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也说过，“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这对于我们青年正是一个宝贵的教训。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我们青年要在这上边来学习。

毛主席使普遍的真理具体化，实现在中国土壤上的时候，并不是说，定出办法来就算了，不管大家懂不懂，接受不接受，说做就由几个人孤立地去做。不是这样的。毛主席总是再三再四地舌敝唇焦地讲，反复地讲，使这个真理为大家接受，变成了力量。所以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毛主席在党内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形，他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如我刚才说的，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像刚才说的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在长征路上，毛主席又提出了他的正确意见，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错误路线，带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冲出了危险的局面，到达了陕北。最后证明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多数是错的。这都

说明，正确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的时候，怎么办？就要等待，就要说服。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组织上还要服从。当着群众被蒙蔽的时候，不容易接受真理，等他们慢慢地觉悟起来以后，就会拥护正确的意见。所以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假使那时党的领导机关很早就接受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革命就不会受那么大的损失，我们的力量就会更加壮大。但是我们这个落后的中国社会，反映到党内，反映到革命团体里，正确的意见常常不容易被大家立刻认识。这样就要等待、说服，就要经过痛苦的过程。不过，这种情形在今后的工作中遇见的会少了。因为今天共产党的中央不像当年了，绝大多数同志都承认毛泽东这个领袖，都心悦诚服地信服这个领袖；在人民中也拥护这个领袖。但是，这也仅仅在大的方向上。譬如说，今天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在这样大的方向上大家都同意，而在具体的政策、工作上还是会有很多争论的。所以就需要学习，学习毛主席这种坚持真理，指示原则方向并将其具体化，成为人民的力量过程。这不是急躁所能做好的，要有很大的坚持性忍耐性，不屈不挠地把革命推向前进，这样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我们不能认为把一个简单的口号提出来就算了，就够了；也不能行不通就失望，行得通就自满，不再前进。那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都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

毛主席在坚持真理、实现真理中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他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不错，

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同时今天大家也都承认他是全国人民的领袖。从中国共产党的范围来说，他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数量只有几百万，在全中国的人口中连百分之一还不到。代表这样一个阶级的共产党怎样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主席的根本着眼点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到中国，争取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来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不是把自己缩小到最小的圈子里来空谈革命。毛主席懂得，为把最反动的敌人消灭，就需要集合一切可能集合的力量，而不是只靠先锋队办事。无产阶级是先锋队，但不能仅靠先锋队。在大革命时，毛主席就看到农民是最广大的同盟军，不依靠农民，人民革命是不能胜利的。果然，不听他的话，革命就失败。后来我们到了农村，毛主席又看到革命不但要依靠农民，而且还要争取中小资产阶级，因为当时蒋介石反革命的恶迹更加暴露，只有买办官僚地主封建阶级才拥护他。但是在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又犯了“左”倾错误，眼光狭小得很，认为中小资产阶级都不可靠。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致使革命又受到一次挫折，走了一个两万五千里。以后，毛主席提出团结蒋介石上层分子抗战。有人就说，要团结就不要斗争。毛主席说，这些人是我们国内的敌人，为了打民族敌人，要团结他，但他并不是可靠的合作者、同盟者，还要提防他，如果不加提防，他反过头来就会咬你。当时毛主席就防止了右，防止了无条件妥协。这一次解放战争，在乡村搞土改，工作中又犯过“左”倾错误。因为要消灭地主，就不给地主土地，或者给地主坏地，使他们不能生活，或者定的封建富农、地主的数量过多。另外，在杀人问题上，本是除怙恶不悛、人人痛恨的要杀外，其他可以不杀，但是有时候在群众愤恨之下，没有加以区别，领导没有说服群众，以致杀人过多。这样

就使我们阵线中的农民，首先是中农受到影响。这个错误，也是毛主席把它纠正了。从这四个革命阶段可以看出，毛主席统一战线的观点是要团结最广大的同盟军，各个击破敌人。在抗日时期，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走后，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中国的反动统治。在乡村中，打倒封建地主阶级——这是反动统治的根基。在国际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围绕着这些口号，把更广大的农民团结在一起，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所以毛主席对我们共产党的许多干部谈：你们每天写日记不要写别的，就只写一句“团结百分之九十”就行了。我想，在毛主席领导下，争取大多数，为着共同事业奋斗，消灭反动统治，这一政策的运用，是我们最大的成就。这一点我们青年要学习。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胜利实现，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做许多艰苦的具体工作，不屈不挠地前进，长期地奋斗，努力争取大多数的人民，争取大多数的青年群众跟着我们走，而不是靠着我们这个小队伍。

青年联合会最大的作用就是组织全国广大青年，推动与教育他们，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共同前进。我们联合青年，不包括反动青年，不能让他们钻进来。但是，我们必须把愿意为新民主主义事业奋斗的青年完全包括在内。这些愿意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青年，思想虽然还不是一致的，但是今天他们愿意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之中有些人虽然还有迷信观念，落后观念，或单纯的技术观念和片面的观点存在着，我们也要把他们包括进来。因为我们可以教育改造他们。因此，我们提出一个学习的口号和目标，即“学习毛泽东”。这个口号和目标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不仅是进步的青年能接受，其他青年也能接受。当然，团结教育青年，并不是只给大家讲共产党

的好主张，不讲共产党犯过的错误。在这个青年会议上，我们不但向同志们隐蔽共产党的错误，相反，有好多错误在今天都讲出来了。我今天讲的一些党内的事情，你们过去是不晓得的，甚至党内有的同志也还不晓得，可是你们今天就晓得了。今天你们所代表的，不是几百万青年，而是几千万上万万青年。那就要请你们考虑，共产党不能冒昧地把他的主张压在成千成万的青年头上。这样的思想是国民党的统治的思想，人家不能接受硬叫人家接受，把帽子在人家头上一戴，像观音菩萨的紧箍咒一下子箍在孙悟空头上。学习毛泽东，我们不是用压迫的方法。这只是我们提出来的口号，这口号很响亮，能使广大青年接受。因为毛主席在今天不单单是中国青年的领袖，而且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我们的一面旗帜。

这里需要解释一个思想自由的问题。反动派常常说他们主张思想自由，蒋介石就是这样说的。大家知道这是鬼话，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还有什么自由呢？人民普遍地受压迫受剥削，只有少数的地主官僚资本家反动分子有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地剥削、压迫、屠杀人民。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只有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广大工人农民没有思想自由。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人民大众是有充分的思想自由的。只要不是反动思想，其他思想都可以存在。不仅是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可以存在，就是相信宗教的思想也可以存在。除了反动的思想不允许宣传外，其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都是自由的。共产党认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最正确的，毛泽东思想是最正确的。这个当然要讲。但也不是不让这个思想以外的思想存在。我们以我们的思想教育大家，但是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可以自由选择。这样才是一个

教育的态度，领导的态度，才是一个共同工作的态度，合作的态度。

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学习毛泽东”，但也不限于这个口号。在这个口号之下，我们青年还要分门别类地学习，比如新民主主义的建设，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知识，各种专门科学技术，都需要学习。学习，也正是毛主席的一个特点。他就是日夜不息地学习，他从来也没有感到满足过，他常常说这方面不会还要学习，那方面不会还要学习。我们要做他的学生，就要学习他这个精神。

我讲这样几点当然不是介绍毛主席的全部功绩和主要学说，我说的仅仅是毛泽东思想的很少的一部分。毛主席创建人民军队方面的成就，他在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在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经济上的一些文章，在文化上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哲学上的创造，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等等，多得很。毛主席的成就不仅广，而且专，而且精，在这里不多说了。毛主席的学习态度，他自己的口号是“实事求是”。他是最老实的，是则是，非则非。他是最反对骄傲反对急躁的。在三十年的革命运动中，他就是在反对骄傲反对急躁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他的作风也是谦虚而又谨慎的。正如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所说，既有着革命的胆略，又有着求实的精神。所以我们要学习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态度、作风上，也就应该老实，不要沾染浮泛与骄傲急躁的习气。中国共产党在人民革命运动中有过这样的经验。我在过去也是急躁的。当然这不是青年一代很容易学成功的。我们要兢兢业业，力求少犯错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要重复错误。青年人没有不栽几个筋斗的，没有不碰几个钉子的。碰了钉子后，不要气馁。我们在革命斗争中不知流过

多少血，遭受过多少挫折，有多少人倒下去了。在最困难的时候，不要丧气，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从地下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前进。要有这样的志气，要有这样的勇气。我们今天即将夺取全国的胜利，光明在照耀着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因胜利而骄傲起来，觉得不可一世，而忘掉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毛主席说，夺取全国胜利才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有很多很艰苦困难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这里有两种教训值得注意：一种教训是看不起别人，脱离群众；一种教训就是蜕化了。这是我们青年的“敌人”。我们应该排除急躁、骄傲、气馁、灰心、丧气，学习毛泽东的学习作风和工作作风，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稳步而又勇敢地前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带动上万万的青年前进，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全国人民的民主解放和民族独立，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并且为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我们的口号是：“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黄华同 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问题 给南京市委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日)

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

辰齐电悉。

(一) 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

(二) 见面时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

(三) 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说来，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

（四）与司徒雷登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

（五）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

（六）谈话时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采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采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

（七）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中 央

辰灰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中央军委对南京市委关于卫戍部队 处理外侨问题守则报告的批示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

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

辰虞电告关于卫戍部队处理外侨问题守则全文悉，中央完全同意，除在南京施行外，望华东局通令各大城市卫戍部队一体遵行。^{〔1〕}

中央军委

辰元

附：南京市委关于卫戍部队处理 外侨问题守则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

中央并华东局：

兹制定卫戍部队处理外侨问题守则，以口头向连队传达实施。对外面则不以文字公布，统限二天传达完毕，跟即开始实施。兹将守则全文报告如下：

卫戍部队在执行勤务时处理外侨问题守则

第一，负责保护一切守法外侨及其财产（包括原外国派驻伪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馆、领事馆、外侨住宅、医院、教堂、学校及工商事业等），防止匪徒及特务分子进行破坏。

第二，非经军管会外侨事务处、警备司令部和市公安局之指示或批准，我方任何人员：

（一）不得进入外国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外侨住所、教堂。

（二）不得占用外侨房屋。

（三）不得与外侨来往交际，特别绝对禁止与外国记者及外交人员谈话，并对房产权有怀疑或争执时，亦只许报告情况，不得擅自处理。

第三，如遇火警、匪警急需消防与捕盗时，卫戍部队及公安机关有执行之责任。为执行此项责任，得给予卫戍司令部或公安分局指派专人进入失事外侨住所，指导实行之。但严格限于上述责任范围。

第四，每日从晚十一时起，次晨五时止，为停止通行时间。在此时间，外侨不得在街道上行走，如有外出者，哨兵即劝其返回，如遇紧急事务（急病、分娩），则应一面派人护送，一面报告上级存查。如有其他特殊事故要求通行者，则应迅速报告司令部，批准后才得放行。

第五，外侨在市区范围以内（城圈以内）行走时，所有卫戍哨兵与风纪卫兵，均不得阻留或盘问，但如有要求至市区以外旅行者，则必须持有南京市府、公安局所发之旅行许可证，否则，上述哨兵及检查站有权制止其通过，劝其返回。

第六，准许外侨在该市区内，携带包裹来往。未奉公安局、警备司令部命令，不得阻留及检查。

第七，在我未登记汽车、发给汽车通行证以前，外侨汽车准其在市区内行驶，但不得驶出市区范围以外。各城门守卫遇有外侨坐汽车驶往城外时，有权制止，劝其返回市内（将来汽车通行证颁发后，无通行证的汽车不准通行）。（详细办法另行规定。）

第八，一切外侨均不得身着军服或带武器在街上行走，卫兵有权令其返回住所或制止其外出。

第九，外侨违反上述四、五、七、八条规定时，一般应予以劝告、警告，令其遵守。如仍有无理抗拒违法，而可不必马上扣者，则哨兵应查明其姓名、国籍、住址、护照号码、汽车号码报告市公安局和警备司令部办理。只在劝阻无效与十分必要时，始可派人将其送交公安局或警备司令部办理。

第十，我警卫人员在执行上述一切勤务时，均须保持坚定严肃之态度，注意说明理由，劝告对方遵守。如其违反法令，须交公安局与警备司令部时，一律不得捆绑，并绝对禁止有伤害、打骂、侮辱等行为。在执行职务遇有疑难问题时，应随时与警备司令部和市公安局外侨管理科商同办理。

以上守则，请中央核准指示。在未得批准以前，发作警备部队之参考。

南京市委

辰虞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1〕中央军委在批复南京市委报告的同日，将报告转发给中原局、四野，华北局、军区，山东分局、军区，西北局，一野，并指示：“望将南京市委所拟卫戍部队处理外侨问题守则通令进入各大城市部队一体遵行。”

军委转发第四野战军关于入城部队 必须遵守的纪律的规定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

转西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及一、二、三野。

军 委

辰铤

各兵团各军并报军委总政：

我们即将进入武汉、南昌、长沙及江南各省诸城市，在进入城市时，一切入城部队和接管城市的人员须仿照我军进入平津的榜样，切实遵守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与入城守则，严格保护一切，一切原封不动，以等候接收，力戒进入锦沈时的不守纪律、乱抓物资等不良现象。兹根据中央军委有关城市政策各项指示，规定下列各项作为我军入城必须遵守的纪律，盼各部在所属指战员中事先进行教育，入城后须切实执行。

(一) 凡市内卫戍机关军风纪、交通规则、娱乐场所规则及公众卫生等，军队人员必须共同遵守，并服从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之指挥，不得借口隶属关系不同，而有丝毫违抗。

(二) 保护城市人民生命财产，不许侵犯，除现行犯外

（例如抢劫、放火、行凶等），各机关、部队不得擅自捕人。

（三）保护外侨（包括领事馆）不加侮辱。凡遵守人民政府法令与安分守己之外国侨民，一律予以保护，并尊重其人格以礼貌待之。其有违法或破坏行为者报告上级及军事管制委员会处理，不得自行处理。一切有关外侨事务，不论大小均由最高机关办理，各部无权处理。没有命令不得进入外侨住宅。不准住外侨的房屋或教堂、学校。对外侨与外侨住宅无命令时，不得施行室内检查与人身检查。

（四）我军各部人员不得接见中外新闻记者、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

（五）军人进入戏院、电影院、理发店、澡堂，看戏、看电影、理发、洗澡及进入公共娱乐场所游览，及乘坐电车、公共汽车者，均须照章买票，照章付钱，不得要求免票或半票付钱。

（六）不经上级许可，不得接收人民的慰劳，对各阶层人士给军队个别人员送礼和被邀请吃饭赴宴者尤需谢绝。

（七）军队在城市特别在大城市、中等城市驻扎时，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免引起城市居民的不便和不利，而应驻扎在兵营、公共机关、庙宇、祠堂、公所、会馆等公共场所，对公共房屋建筑及家具设备（电灯、自来水、玻璃窗、抽水马桶等）必须爱护，不得移走拆毁与破坏。

（八）军队之骡马大车不得入城，必须入城者可在将所运物资、弹药、粮食等装卸后即行出城，在城郊外择地关喂，禁止在市区内关喂，禁止在市内树上拴牲口，以保护树木，不让牲口啃树。颁布驻城市的应以师或团为单位，在市外组织马场喂养。

（九）不准乱放枪，如需举行军事演习或试枪者，须经警备司令部批准，事先通知，在城郊空旷地举行。

（十）组织营房的文娱活动，不准上街乱跑，严格执行请

假制度。

(十一) 整顿军容，提倡礼节。

(十二) 部队担任警戒，对职务须认真执行，但对群众态度须好，不可横蛮无礼貌。

(此文件收到后将报尾报头略更改发到团)

林罗萧谭陶^{〔1〕}

十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林彪、罗荣桓、萧劲光、谭政、陶铸。

毛泽东、朱德给林遵等的复电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

林遵将军、邵仑舰长、李宝英舰长、吴建安舰长、张家宝舰长、宋继宏舰长、易元方舰长、郭秉衡舰长、韩廷枫舰长、陈务笃舰长、杜澄深队长、张汝樵队长和第二舰队的全体员兵们：

庆祝你们在南京江面上的壮举。你们率领二十五艘舰艇，毅然脱离反动阵营，参加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家庭来，这是值得全国人民热烈欢迎的行动。在巡洋舰重庆号于二月间起义并被国民党反动派于三月间炸毁以后，四月间又有你们的大规模起义，可见中国爱国人民建设自己的海军和海防的伟大意志，不是任何反动残余所能阻止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和工作制度，并继续学习海军技术，为中国人民海军的光明前途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

根据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印。

军委关于外国军舰 轮船进入黄浦江的处理办法 给粟裕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

粟张，并告总前委，刘张李^{〔1〕}：

皓未、号午两电^{〔2〕}均悉。

(一) 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

(二) 但如有外国军舰在上海停泊未动，并未向我军开炮者，则不要射击。

(三) 中国及外国轮船为敌军装载军队及物资出入黄浦江者，亦应攻击之。

(四) 中国及外国轮船在上海停泊未动者，或得我方同意开行者，准其停泊或开行，并予以保护。

(五) 为了对付外国军舰的干涉，你们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实力准备，即要将外国干涉者的武装力量歼灭或驱逐之，如感兵力或炮火不足，应速从他处抽调补足。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六）号午电说有二舰挂外国旗，请查明系挂何国旗，以便公布。嗣后，凡关外舰事件，应将详情查明具报。

军 委

号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指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2〕指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未时和二十日午时粟裕、张震给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的电报。十九日电说，十八日下午有美舰三艘带国民党轮船六艘及风船等开出吴淞，今后何种船只可以炮击，请指示。二十日电报告在高桥以西至林家宅沿江之线有敌舰五艘，其中两艘挂外国旗，三艘无旗，向我阵地猛烈炮击，以掩护敌军对我阵地的出击。因五舰靠在一起，怕打错，已严令不准打。为此，给我阵地坚守增加极大困难，请示如何处理。

朱德关于组织 劳资双方发展生产问题 给邓子恢的复电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

子恢同志：

卯俭致中央电悉。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到城市，但各地在执行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上，曾经发生过并继续存在着若干偏向，偏向的表现有“左”的，也有右的，有的地方甚至“左”右两种偏向同时存在。“左”的表现，如分房屋、分店铺、过分提高工资和工资问题上的平均主义及农业社会主义倾向等，自去春以来经中央多次批评纠正，现已大体解决了，但并未完全根绝。平津解放后，党政负责人在相当长时期内对私人工商业资本家冷淡不理，不向他们正面宣传解释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政策；他们就惴惴不安，多所顾虑，对复工、复业抱敷衍态度，对发展生产不积极；对职工的过分要求不敢据实解释，因而发生了部分私营小工业和手工业工人的工资超过了国营的大规模的现代工业工人的工资，及东伙私自妥协把铺子分了的象（天津分了几十家，北平也有）。又如在公营企业中，工人与企业管理干部的对立以及一般地反对旧职员等等。右的表现，如站在资本家方面，禁止工人罢工。淮南煤矿接管后，三个月来对职员是实行原职原薪，对工人则每月仅发

几十斤粮食的维持费，致引起工人怠工请愿；还有的公私合营企业的经理（我们派去的干部）徇私人股东之请，开除党员工人，原因是该工人同志曾揭发私人股东贪污舞弊（泊镇的例子）；洛阳市的工作方针曾提出以资本家是否发财为检查洛阳市工作的标准，《洛阳日报》不敢把毛主席的一月十四日的声明登在第一版；又如在发展生产上公私不分，工商不分，在宣传上重视资本家而忽视工人以及宣传工人感激资本家等等。

我在铁道部运输会议上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提出“四面八方”的政策。在劳资关系上，主张两方面都要顾到，既不要“左”，也不要右，既要照顾到工人生活，也要使资本家有利可图；既要组织工人，教育工人群众，提高工人的劳动热忱，也要利用原有的资本家的组织（如同业公会、商会等）向资本家进行宣传，解释我们党的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政策，消释资本家的顾虑，提高其复工、复业从事生产的积极性。只有广大工人群众与正当的私营工商业资本家都动员起来了，才能实现恢复与发展生产。单动员一方面是不行的，光资本家积极复工、复业不行，光工人积极劳动生产也不行。这是目前中国经济条件所需要的，这与二中全会所指出的依靠工人阶级还要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与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的路线是一致的。自然，我们所说的双方照顾是有重点有立场的，是依靠工人阶级，是从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争取团结工商资本家。至于说组织工人，教育工人群众的工作与动员资本家积极复工、复业、发展生产的工作之先后次序，那是步骤问题，不是原则问题，可依当地具体情况分别进行。但如照卵俭来电所称“先组织资方，或劳资同时组织，而不应该先组织劳方”，那就涉及原则问题了，那是错误

的。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或者是许子威同志听错了。

朱 德

辰芻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 成立外文翻译机构的决定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东北局，华北局，西北局，晋绥分局，华中局，华东局，山东分局，中组部，中宣部，外事组：

中央关于成立外文翻译机构及其人员的训练和调查的决定：

(甲) 关于成立外文翻译机构及其译员问题：

(一) 中央决定在中央及军委下设立俄文编译局，担任口译、笔译，并主持俄文人才之训练、调查与分配等项事宜，以师哲同志兼任局长。目前必须从中央各部门与各地征调若干有翻译能力及政治条件适合的党员参加编译局的工作。请东北局将东宣部翻译处的十余名笔译人员全部调给中央。并另从东北各地及旅大物色十个到十五个适合上述条件能担任俄文翻译的党员，于最短期内调来中央。责成华北局、华东局（及山东分局）、华中局、西北局（及晋绥分局），各于一月内挑选和推荐出合乎上述条件的三人至五人，将其简单履历和鉴定呈报中央，以便审查和调用。

(二) 中宣部应会同各有关部门共同筹设一个编译馆，暂归中宣部管理。内分各重要外国语文部，担任编译各部门一般所需用的重要书籍。为了配合工作，各部门应取得连系，定期

会报，协商并调整编译计划。而俄文部门的编译计划，应由中央俄文编译局协同中宣部负责审查，以期协调。

(三) 中央各部门的俄文翻译干部，应由各该部门负责审查，并推选其中优秀而政治条件适合并可以担任党内翻译工作者，送中央俄文编译局审查。中央编译局得征调其担任局内工作。

(四) 党、政、军、民各部门，如由于工作的直接需要而设置或将设置俄文译员者，应将其履历鉴定由党组负责同志审查列表送交中央俄文编译局登记备案。

(乙) 关于训练外文翻译人才问题：

(一) 中央责成各中央局设立俄文学校（例如哈尔滨、大连等地已开办的俄文学校），或在外国语学校中添设俄文部，并将筹备设立或已经设立的情况电告。

(二) 中央责成中宣部及外事组将北平原有之外事学校及华大俄文系合并成立一个外国语学校，暂归外事处管理，分俄语、英语两部，扩大学员到五百人至七百人。除原有学员外，应再从华大、革大考选已有外语基础的学生，加以补充。如不足额时，应再从南京、上海、武汉等处大、中学生中选送一部分来。一般俄文系的教育方针，应报告中央俄文编译局审查批准。

(三) 决定在中央俄文编译局下设立一俄文专修馆（较高级的），暂定名额五十人。从东北、华北各俄文学校中选调已有俄文一般基础者，以及由各地党推荐的懂得俄文的党员组成之，以资实习和深造。中央责成中组部迅速选调四或五名有管理能力的干部交俄文专修馆担任校务及教务工作。

(丙) 关于俄文干部的调查登记问题：

(一) 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组织部负责调查登记学过

俄文的男女干部。调查表格由中组部制定发出。各地方应将每个人的登记表送二份交中组部和中央俄文编译局审查备案，以便必要时调动使用。

（二）中央并责成各主要市政府，如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北平、天津、济南、开封、南京、杭州、武汉、上海等市政府，在其旧职员登记表上，应增添“熟悉何种外语及其程度”一项，以便必要时考选征调，担任一般的翻译工作。

中 央

辰马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中共中央转发华东局 对无锡市恢复和发展生产指示 给华中局等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华中局，林罗谭^[1]：

兹将华东局辰寒给无锡市委的复电转给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抓紧对于新占各城市的政策指导，不要过了很久才去检查和指导。如果你们同意此件，请转发武汉市委、湖北省委及湘赣两省委。关于武汉市委的工作，请要市委每数天报告一次。

中 央

辰马

附：华东局对无锡市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

苏南区党委，转无锡市委，报中央：

管文蔚同志对无锡接收后十天（四月二十八日到五月八日）的工作报告，很好。你们对该市公家财产的接收工作，即

* 这个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

告结束和清理阶段，所以，你们的注意力，即应把中心转到对于生产问题的处理。无锡是江南除上海外的最大工业城市，处理得好不好，对上海及其他城市均将发生很大的影响。而要把生产问题解决好，就必须根据毛主席指示，从劳资、公私、城乡、内外等四面八方去考虑问题，妥善的解决问题。无锡的工资问题，业已提出，工人和资方均希望能做最后决定。最后决定，目前尚不可能，但作出适当的暂时的解决，甚为必要。否则，厂方、工人顾虑均大，很难复工生产。解决的方法，仍宜用双方和平协议，政府加以仲裁的方式。一般采用原来的工资标准，力求迅速开工。军管会只宜对原来标准中个别极不合理，急待改变而又比较容易改变者，加以适当的调整，切不可牵动太大太多，拖延时间太久，影响开工和生产。可以向双方说明，迅速开工，于劳资双方均属有利。许多问题可在开工之后，从长计较，合理解决。这样解释，是会为资方，也会为工人所接受的。同时，在规定工资标准时，还应照顾到公私企业大致相等。大工厂同小工厂的差额不要比过去增大，以免影响小工厂无法开业与解决工资问题。同时，对于恢复生产的各项困难，如燃料供应，原料来源，和产品推销诸问题，应鼓励资方多方设法解决。政府亦可在可能的范围内，在公私兼顾的条件下，予以协助（如煤炭供应）。你们已经注意到对于工人的组织和教育，这是很对的。但在教育中，要注意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上去说服工人，做到发挥党的劳资两利的方针，防止可能产生的“左”的倾向。但你们对于劳资关系中一些不合理的東西，应开始着手研究，然后，视条件许可的程度，在劳资双方的协议下，特别在今年发展的条件，逐步的使之达到合理的解决。这里，你们还应使我们同志和工人了解，恢复和发展生产，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积极性是办不到的。而资本家又是

在有利可图的时候，才会有积极性的。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对私人资本主义，是采取限制政策。这个限制政策，是依各地各业及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而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是既要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诸方面加以限制，而又不得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太大太死的经济政策。这些原则，在二中全会决议中，已有明确规定，请你们注意研究。今天，无锡的资本家，正从多方面试探我们的态度。他们企图保持其原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地位。他们在长远的岁月里，将要在各种形式下，同我们进行阶级斗争。你们对此有所警惕是对的。但是，你们切不可同他们的关系弄得很紧张，而应主动的同他们的代表人物接触，召开资本家的座谈会，详细解释我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业政策，用开诚坦率的态度，告诉他们，抛弃反动分子，以利于我们同他们的合作。在政治上，你们还应考虑，在适当时机，和适当形式（如各界代表会之类）下，容纳其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政权活动。对此，你们应有所准备，对荣德生、钱荪卿等资本家的态度，前电已有详细指示，望照该电执行。据说，在荣、钱的企业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对此，你们应注意调查。对于清理私人企业中的官僚资本部分，不要性急。在秩序已定，工厂已经复工之后，再去进行，也不为迟。清理的步骤和方法，应由你们在调查后拟出，报告我们批准，然后施行。总之，你们当前的重点，应放在如何使八百九十二家公私大小工厂开工生产。其他一切工作，均应环绕此一基本任务去进行。此外，你们报告中，还有两个问题，答复如下：

（一）对于导报、锡报、民报，应根据审查其一年报纸的结果，指明其为反动刊物，拒绝其复刊的要求。要善意的告诉

钱荪卿等，恢复这种反动刊物，对他们政治上有损无益。目前，各地均不宜允许资本家办报，但亦不可明白说出不允许资本家办报，请予注意。

（二）学校取消训导制是必要的。但应在各学校中宣布尊师爱生，严守校规，努力学习的方针。同时，请你们在一两个公立学校试行设立生活指导部（处）的制度（这种制度，在山东、苏北业已实行），看试行结果如何，再决定是否普及或采用其他制度。又据新华社八日电讯，北平三大学，已成立校务委员会。这种组织，亦可在一两个公立学校予以试行。但须在一个时期之后，各项条件准备成熟的时候，才去试行。马上办，不会有好结果的。至于学校课程的改革，可照你们拟定的三个步骤，稳步的实行。

华 东 局

辰寒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1〕指林彪、罗荣桓、谭政。

军委关于各野战军进军部署 给总前委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总前委，刘张李，粟张，并告林罗，彭贺^{〔1〕}：

(一) 粟张养午电^{〔2〕}悉。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

(二) 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

(三) 四野现有两个军渡江，尚有六个军已至陇海、长江之间，约于六月上旬可渡江，另有四个军正由新乡、安阳地区出发，约六月中旬可以渡江。四野主力（六个军及两广纵队）于七月上旬或中旬可达湘乡、攸县之线，八月可达永州、郴州之线，九月休息，十月即可尾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一野（四个兵团三十五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四）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则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如果二野能于八月一日左右开动或更早一点开动，则上述任务是可能完成的。但此项任务在二野内部暂时不要下达，因为中央对此尚是一种拟议，最后决定要待上海、福州占领之后。

（五）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因此，除二野应准备经贵州入川之外，四野在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之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请林、罗即令曾泽生军早日出动南下。该军是否已从热河出发，盼林、罗查告。

（六）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军 委

辰梗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张震，林彪、罗荣桓，彭德怀、贺龙。

〔2〕指粟裕、张震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午时关于请示入闽部队何时出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

中共中央关于通报平津 接收企业经验给华东局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南京市委：

据平、津经验，我占城市初期，如果接收企业的人员只准备接收，不准备经营，待接收之后再派人经营，则接收人员存“五日京兆”之心，无心经营，浪费物资，对企业生产损失甚大。因此，接收初期派去接收企业的负责人，即应尽可能选择那些可以付托他们经营的人们，嘱咐他们不但要接好，而且要管好，使生产不受损失，此点务请注意。此外，不可把企业物资（存厂的或已交给国民党政府、政府尚未付价的都在内）当作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如果把企业物资（纱布、被服及其他制造品）当作战利品消耗掉，则政府势必要向企业付价，企业才能继续开工，否则企业即将停工，无力继续生产。此点亦是平、津的经验，前已告华东局，现再重说一遍，请你们转知所属注意。

中 央

辰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军委关于预备对策防备帝国主义 武装干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彭贺，刘邓，陈饶粟，林罗^{〔1〕}：

(一) 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象征。例如美国正在和英、法等十二国会商统一对华政策，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留在南京的各国大使准备撤走，英国在香港增兵，广州国民党亦有某些高兴表示等事，可以看出这种象征。将来是否会演成干涉的事实，目前还不能断定。但我们应当预备对策，以期有备无患。

(二) 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在这方面，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站在我们方面，极为重要。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的袭击和扰乱。

(三) 关于预防美帝协同国民党向我后方袭扰，除已令杨成武兵团及钟赤兵炮纵在秦皇岛、塘沽布防外，特作如下部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署：甲、杨得志兵团和十八兵团一道继续向凤翔方向前进，准备在各兵团会合后，歼灭胡、马^{〔2〕}在陕甘边境上的主力。如此战能达目的，而华北情况又有需要，则准备将杨得志兵团留在宝鸡、凤翔区域待机，同时尽可能赶快修复洛阳、宝鸡段铁路，以利运输。乙、林罗留一个军位于河南，平时担任剿匪，有事增援开华北。丙、陈饶粟以一个军附必要数目的炮兵开青岛附近，待命夺取青岛，尔后即任青岛守卫。南京、镇江、苏州区域已有两个军，浙江区域已有三个军，甚好。吴淞、上海区域应有七个军，特别注意加强吴淞、江阴两区的炮台设备。以上各军，除担任城市守备及乡村剿匪任务者外，均应迅即部署整训。攻取福建的兵力，不要超过两个军。丁、二野全军除一部待命渡赣江配合四野歼灭桂系于袁水流域外，其余在六、七两月内，位于现地主要进行整训，附带帮助剿匪，待两个月后，看情况再定行动方针。

（四）以上各项，你们有何意见，望告。

军 委

辰俭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注 释

〔1〕指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饶漱石、粟裕，林彪、罗荣桓。

〔2〕指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

祝上海解放^{*}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新华社社论)

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欢呼。这是因为，第一，上海是中国的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第二，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这两种情况，使得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上海的命运实际上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在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冒险家们曾经把上海看成是自己的乐园，在上海制造了种种盗劫、屠杀、侮辱和愚弄中国人民的罪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一个走狗，中国封建主义的最后一个暴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集大成者蒋介石，就是由上海的流氓组织起家，因为造成了上海工人的大流血得到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喝彩，建立起他的以上海买办经济为基础的二十二年的黑暗统治，并且直到最后，还以屠杀和破坏来向上海人民告别的。在另一方面，上海又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虽然在反革命势力以野蛮的白色恐怖迫使中国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转入乡村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

* 这篇社论经毛泽东修改后发表。

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相配合，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

上海的解放当然要加速完成中国内外关系的一系列根本变化，这些根本变化当然要使新中国的地位一天比一天光明。在上海、南京、杭州、九江、南昌、汉口、西安等枢纽城市解放以后，中国的反革命已经被打碎成为零星的小部，逃入边远的地区，而这些仓卒筑成的反革命巢穴也绝不能维持多久。中国在短期间虽然还必须负着战争的最后阶段的负担，但是生产建设已经成为一天比一天重要的课题。上海和其他中国大城市在以前曾经不能够顺利地发展生产，并且常常成为生产的障碍物，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革命的敌人恐吓中国人民说：你们不敢占领上海，因为你们无法管理它，除非你们向我们屈服。这些大言不惭的人们并且设定种种的图案来安慰自己和互相安慰。但是现在不是他们在赌场中继续赢钱的时候了。他们在中国的问题上已经再三失败，如果他们不相信中国人民能够把上海管理得好，那么他们只能再增加一次失败。上海是一个生产的城市和革命的城市，在反革命统治被捣毁以后，这个特征将要显出伟大的威力。上海的几十万工人，几十万其他劳动人民，几十万知识分子，和有爱国心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是第一次不受压迫地联合在一起。上海和全国的其他城市，和全国的乡村，现在也是第一次不受压迫地联结在一起。尽管因为战争，因为敌人施行了长期的破坏并将以隐蔽的方法继续破坏，还因为缺少成熟的经验，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要遇到各种意料之内和意料之外的困难，我们决不可轻视这些困难，谁要是轻视这些困难，因而不采取认真想法克服这些困难的步骤，我们就会要犯极大的错误；但是这些困难在上海各民主阶层的协力奋斗之下，在全国各民主阶层的协力奋斗之下，没有

不可以依靠自己而克服的。

上海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所以上海的解放不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国际和平民主阵营的世界性的胜利。对于解放了的上海和解放了的中国，世界上的不同人物表示了不同的反应，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是有益的，因为这使中国人民可以很容易地认识他们的面孔。中国人民对于国际事务早已宣布了鲜明的立场，其最近一次便是四月三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的声明。李涛将军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的基础之上，首先是各外国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将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这个声明是公平合理的，毫无疑问，中国人民是支持这个声明的立场的。中国人民愿意在上海或在其他任何地方和任何外国人民友好合作，但是若干外国的政府不但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和国民党反动派站在一起反对中国人民，那么，人们之认为这些政府是采取了一种对于中国人民的不友善态度，当然没有什么奇怪。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那么，它们就应当着手改变它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根据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华北局，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山东分局，平津济沪宁汉诸市委，各野战军前委：

兹将中央给东北局辰世电及其附件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各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中 央
辰世

附：中共中央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
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东北局：

最近邹大鹏有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决。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至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现特将邹大鹏来信电告你们，望东北局召集会议，要洛甫^{〔2〕}同志参加并发表意见，然后将东北局讨论的结果电告中央。

最近少奇同志到天津巡视，发现我们在天津的负责同志完全不理资本家，有些干部则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贸易公司在原料及市场方面统制，不给资本家的生产以应有的照顾，税收机关对私人生产亦未给以应有的照顾。在劳资关系上工人有过高的要求和过左的行动，未用坚决的办法去纠正，强令资本家开工，但资本家在开工后的各种实际困难未帮助资本家去克服。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具有这种性质的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例如投机商业等，不是一切私人资本都有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结果就使资本家恐慌消极，陷于半瘫痪状态，完全没有生产积极性，许多资本家就准备停工歇业或逃跑。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因为我们顾虑到在党内存在的上述偏向，故我们尚未批准印发《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方针提纲》这个文件，我们认为在这个文件上必须加上批驳上述偏向的一

段文字之后，才好印发。

中 央
辰世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注 释

〔1〕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经毛泽东修改。

〔2〕即张闻天。

建立有工作能力 的中央财政经济机构^{*}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刘 少 奇

一、由于人民革命战争正在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为了尽可能迅速地和有计划地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借以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应即建立有工作能力的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并使各地方的财政经济机构和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建立正确的关系。

二、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立即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陆续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为目前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在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前的几个月内，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建立之，并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委托，计划并领导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中央各财政经济部门在财政经济计划方面应服从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决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应加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为委员。

三、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委员人数，由中国人民革命军

* 这是刘少奇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

事委员会以命令定之，其决议，由过半数到会委员之多数通过成立之，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停止或修改或废除其决议。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至数人，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四、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应陆续设立下列各工作机关，在委员会及主任与副主任领导之下，分别地进行工作。

(一) 中央计划局，在可能范围内负责审查与拟定关于财政经济方面的计划。局内设统计处、供应处、国家资源调查登记处、地质勘察处等，并得按各财政经济部门逐步设立若干计划组。

(二) 中央财经人事局，在可能范围内负责管理财经领导干部、技术专家及一般职员和工人的训练、登记与调动等事务。

(三) 中央技术管理局，在可能范围内负责管理有关新的技术之发明、采用与推广等事务，并得按各项技术性质逐步建立若干技术组。

(四) 私营企业中央事务局，在可能范围内负责管理对于私营企业之指导事务，并得按各项私营企业部门逐步设立若干事务处和设立华侨经济事务处。

(五) 合作事业中央管理局，在可能范围内负责管理对于合作社之指导与协助事务，并得设立消费合作事务处、农业合作事务处、手工业合作事务处、水利合作事务处等。

(六) 外资企业中央事务局，负责管理关于外资企业的事务。

(七) 秘书处，负责管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内部的事务。

五、除开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其所属各工作机关而外，应即陆续建立下列各中央财政经济部门，这些部门即以现

在华北人民政府各财经部门为基础：

（一）中央财政处，负责管理有关税收、粮食、盐务、烟业、酒业、渔业及其他财政事务。

（二）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发行货币、代理国库、管理金融并进行其他银行业务。

（三）海关总署，负责管理全国海关并管理港口、码头及边境检查等事务。

（四）中央商业处，负责管理有关对内与对外贸易及实物配售等事务。

（五）中央铁道部，负责管理全国铁道之运输及铁道之修建事务。

（六）中央交通处，负责管理邮政、电讯、船运、航空、公路等事务。

（七）中央燃料处，负责管理有关煤炭、石油及电力等事务。

（八）中央金属处，负责管理有关钢铁及有色金属与机械制造等事务，并管理军事工业与造船工业。有关基本化学工业及建筑材料工业之事务，亦归金属处管理之。

（九）中央纺织处，负责管理有关棉、麻、毛、丝的纺织等事务。

（十）中央工业处，负责管理除纺织工业以外的有关其他各种轻工业之事务。

（十一）中央农业处，负责管理有关农业、畜牧、垦务及农业试验场、国家农场等事务。

（十二）中央林业处，负责管理有关森林之采伐与培植并管理有关造纸工业的事务。

（十三）中央水利处，负责管理有关巨大水利工程的事务。

六、前条各处之组织条例，另行拟定。

七、除建立上述各中央财经机构外，在东北、西北、华中、华东等区域及在各省各大中城市，均应建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并在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之下设立若干财政经济部门。其组织条例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另行拟定。

八、关于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划分，国家企业之由中央直接经营或划归地方经营或委托地方经营等事，均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决定之。

九、重要国家企业或国家资源之出租给私人经营或开发，其年限相当长久者，其合同须经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后，方为有效。

十、地方财政经济机关在中央与上级财政经济机关的领导之下，执行以下各项任务：

- (一) 执行中央与上级机关指定之任务；
- (二) 管理当地财政工作和金融工作；
- (三) 恢复与发展当地人民经济；
- (四) 经营中央与上级机关划归地方或委托地方管理之国家企业；
- (五) 监督与协助由中央直接经营之当地国家企业。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聘请 党外人士任上海市政府顾问 给华东局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二十五日)

—

华东局并转上海市委：

上海解放后，原拟请一两位党外人士任副市长，曾以此意告陈叔通、马叙伦，并提出史良、盛丕华，征询陈、马及其他人士意见。据反映，认为党外人士任副市长不必过早，对人选亦有斟酌，因此，乃改提聘请一批党外人士，如史良、黄炎培、章乃器、俞寰澄、盛丕华、包达三、陈叔通、王却尘、吴羹梅、胡子婴等任上海市政府顾问，连颜惠庆、江庸、章士钊、张元济等都可包括在内。在原则上，民主人士对此多表同意，并觉得这样做法，较一两个副市长为好，且更能协助政府影响各方，特别是易于联系民族资产阶级及民主知识分子，惟具体人选，尚未与各方交换意见，你们对此意见及人选如何，有无增减，望速复。

中 央

已东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这两个指示是周恩来起草的。

二

华东局并转上海市委：

中央已东电询关于聘请党外人士任上海市政府顾问事，迄今未得电复。现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王却尘、吴羹梅、胡子婴等均已赴沪，如你们无其他严重困难，请即将上述八人再加入原已在沪之颜惠庆、江庸、张元济、俞寰澄、施复亮，及将由港到沪的章士钊共十四人一律聘为顾问，俾其能因联系上海资产阶级而取得发言地位。此事，在已东前，即已与他们谈过，临行前亦曾告以至沪后，请他们利用在沪期间联系各方多提意见，详情已托邓颖超同志面告。此十四人，均将参加新政协，约在上海停留一个月，即须北上，望你们吸引其参加一些工作，中心在动员上海资本家恢复生产，打通航运，打击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活动。其他各人，如马寅初将赴杭州，望电告谭震林、王建安，予以照料，并助其移家北上。许广平、沈体兰、邓裕志、章培、林汉达、吴耀宗、寿墨卿等事毕后仍将来平。黄炎培葬子、陈叔通葬兄，望给予帮助。

中 央

已有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出版的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对日贸易问题 给东北局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

东北局：

关于对日贸易的辰有电悉。在双方有利而平等的条件下，我们不需要拒绝对日直接贸易，而应欢迎日船、日商到中国口岸来通商，以扩大新民主中国在日本人民中影响而加深日、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现在中国各民主党派及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反对在双方有利而平等的条件下进行对日贸易。目前最大的障碍是麦克阿瑟及美国独占资本不容许日商、日船来华贸易，尤其不愿高价的美煤、盐为低价的中国煤、盐所代替，而失去其控制日本市场的独占力。故你们所考虑的，如为日船、日商不易来华，或东北口岸目前不允许日船、日商进口，则可以经过华商、英商或其他外商间接进行，出口货品亦可不标明输出何地。若仅仅因为顾虑中国政治原因，则此顾虑已不存在。你们除与华商、英商接洽外，仍可与日商直接接洽。万一日船不便至东北，亦可至秦皇岛卸货，以利我打通对日贸易和交通关系。如何，望再告。

中 央

巳冬

* 这个指示是周恩来起草的，并经毛泽东修改。

附：东北局关于对日贸易问题给中央的电报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中央并中财部：

英商行和洋行及一些中国商人愿意经平向日本做贸易，其办法是采用私人经营方式，向我们购买大豆、食盐、苦土输出日本，而从日本购入纺织器材、钢及棉花（美棉）。我们的意见：

（一）这些贸易只经中国商人或英商去做，不与日人直接贸易。同时不许日轮、日人到东北。

（二）做时仍须秘密。一切文件不能写明输出日本地方。

（三）大豆、食盐都可以输出，而输入只限于上述的必须器材。

是否可行，请电复。

东 北 局

辰有

根据《党的文献》二〇〇九年第三期
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允许司徒雷登及 傅泾波赴美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日)

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上海市委：

市委外辰世电悉。

(一) 青岛美军舰队确已退走，国民党匪军已东撤完，我军冬或江日可入青市。

(二) 司徒二周后去沪，可许其以外侨身份乘火车前往，但我应予以保护；如彼欲乘美运输机飞沪，即须规定该机降落上海飞机场后，不容再来南京，专门留沪等待司徒第二次赴沪时乘坐回国。

(三) 可同意司徒带傅泾波飞美，当其提出申请并完成手续后，即予许可，并由南京市人民政府发给傅泾波以个人名义的出国护照。在司徒赴沪前，黄华可与之见面一次。

(四) 对美运输机事，可与司徒回国连在一起解决；如司徒不乘该机赴沪，可留在南京等司徒飞美。

(五) 美国有利用国民党逃亡政府尚存在时期，提出对日和约之可能。黄华与司徒会面时，可向司徒指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现在国民党

* 这个指示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

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外国不应再与该逃亡政府发生关系，更不应和该逃亡政府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否则，我们及全国人民将坚决反对。

（六）黄华可向司徒或傅泾波透露个人看法，新政协可能在占领广州后召开，不要说很快召开的话。

中 央
已 江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刊印。

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 委员会的说明^{*}

(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

陈 云

我才从东北来不久，军委会指定我参加筹划财经委员会的工作。关于建立中央财经机构的大纲草案已经发出去，请大家讨论。

以往东北、华北、西北及其他解放区都有地域性的财经机构，但现在有成立中央的财经机构的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日益扩大，财经问题也逐渐增加，并且往往是带有全国性的，这就需要有一个机构来处理这些问题。有许多问题过去没有接触过，今天也需要研究。例如上海解放后，就有了江、浙、皖、赣、两湖、川等地通过上海进出口物资的问题。又如天津解放后，就有了西北地区通过天津进出口物资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中央的财经机构来解决。这个机构初成立是带有临时性的，暂时属军委会管，时间也只是几个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就交给政府。这件事很大，需要党内外同志合作。财经委员会内部也要合作。各部门之间，如工业、农

^{*} 这是陈云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在北平的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业、交通等部门之间也要合作。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经验很少，甚至在许多问题上是没有经验的。最早红军时代谈不上什么经济工作，就是有个把事务长，以后有了根据地，再后有了边区政府、人民政府，也有了供给机关、贸易公司等等，一步步地扩大。以前没有大城市，现在有了大城市，有了国际贸易问题。有一天，晚上十点钟，我还拖住章乃器先生给我上课，讲讲外汇问题。总之，只有大家合作，工作才能做得好。

整个筹划财经委员会的大纲草案，我不一一介绍了，这里只说明两个问题。

首先是组织机构问题。财经委员会本身有六局一处^[1]，下属十三个处、行、署、部、会^[2]。有些事情还没有定。如盐务暂属财政，还有渔业、烟酒属哪里需要进一步考虑。工业部门分得比较多。在中国，过去曾经笼统叫过农工商部，后来分成交通部、实业部或工商部。现在除了铁道、交通之外，又分了燃料、金属、纺织及其他工业四个处。分得细的原因是在各有专职，这是工业发展的需要。

这六局、十三处是否一天就建立起来？全国性计划是不是可以一天弄成？不成，要逐步地来。我们的目的是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而工作则是要一步一步地做。

其次，现在我们正在强调集中统一，而大纲的最后，仍把地方经济放在必要的地位，各大区、各省及各大城市都有财经委员会，这岂非矛盾？我们的回答是，有矛盾，但因为现在是军事时期，中国地方又太大，交通不便，需要地方机构与中央配合。集中统一有两个条件：一是有需要；二是有可能。两者缺一不可。比如火车现在已经统一管理。又如对外贸易，必须统一，假若天津是一种规定，上海是另一种规定，这就不行。但是，现在有很大一部分事业不能集中或不能过分集中。最大

的问题是，三百多万军队有两百多万在前方，给养能不能由后方统一供给？不能。这需要在各地买、借、征，就地解决。部队决不能饿饭，但也不能把老百姓逼反了。比如每人每年平均需要一匹布做衣服，三百万人就要三百万匹布，只能由前方解决。这些事带有很大的地方性。野战军吃、穿、工作、打仗一起搞，这需要统一，但不能过分集中。这一段时间还不会很短。要等打完仗，交通恢复以后，这些问题才能慢慢地解决。有些事中央现在管不了，只能让地方先管着。比如招商局，现在由陈毅他们管，中央一时管不到，先托他们管，所有权属中央，将来需要时，一个命令，全部由中央接过来就是了。

总之，这个财经机构是临时的，是党内外合作的。工作要慢慢地来，地方机构还保留相当的地位。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
《陈云文选》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指计划局、人事局、技术局、私营企业事务局、合作事业管理局、外资企业管理局和秘书处。

〔2〕指中央财政处、中国人民银行、中央海关总署、中央商业处、中央铁道部、中央交通处、中央燃料处、中央金属处、中央纺织业处、中央工业处、中央农业处、中央林业处和中央水利委员会。

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

(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

刘 少 奇

陈云同志方才讲到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这事很急迫，建立中央财政经济的统帅部，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以前我们不懂，这次去天津，与产业界和地方工作同志谈了一谈，才感到这项工作很紧急。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接收了很多东西，外国人要来做生意，交通需要统一，因此财政经济上需要高度的集中。

以前我们的财政经济是分散的。最初有几十个根据地，等于几十个国家，每个根据地都有自己的税收、银行、票子、工商业等。如五台山与太行山这两个地方，十多年都是各自为政，石家庄打下来了以后，两地做生意碰了头，但是票子不过铁路，彼此货物流通都要抽税。那时这边涨价，那边落价，有几千个工作人员在彼此斗争，而且双方都是共产党员。这问题不解决老百姓怨声载道。现在平津与东北不好做生意，就因为税收和票子的问题不统一。天津和上海与外洋都通了电信，但是和沈阳与石家庄却不通。在进出口方面，各地区彼此竞争。山东、华北、东北各地都与香港做生意，但却彼此竞争买西

^{*} 这是刘少奇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在北平的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药、军用器材；出口方面也是一样，大家都想出口，彼此压低了价钱。工业上也存在着割裂状态。例如山东缺少的东西，天津工厂却多得卖不掉；又如天津生产了很多电线，而东北却缺乏电线，彼此间是隔绝状态。要把生产搞好，许多事必须统一，而且许多事可以统一，这就需要总的统帅机构。

本来想等联合政府成立后，再来建立统一的财政经济机构，但是实际情况是马上需要，等不得了。即使从现在就着手进行，到联合政府成立后，是不是可以做得很好还成问题。现在开始着手做统一工作，又怕统一得过多。中国地方很大，很多事有地方性，需要分别办理。如果把不可能或者不需要统一的，硬统在一起，事情就会搞糟。只能按照有需要而且有可能的，初步由中央接管，如把所有的都由中央管，那就不行。我们在管理上是多设部门。如纺织业，单是宋子文的中纺公司所有的人员，就比现在我们中央的任何一个部的人员都要多，再加上丝毛麻等私人纺织业，总共有几十万人，需要一个部门来管。五金方面，本溪、鞍山、石景山、太原等地现有的钢铁业已经不少，再加各地的兵工厂，集中起来也要一个部门管。燃料方面，煤、油据说甘肃方面规模已经不小，各地国营煤矿也相当多，再加上其他动力燃料，事情也很多，需要一个部门管。除财政外，商业对国内外贸易，生意很大，现有的贸易公司，任务重，所以商业另设一个部门管。中央政府多设几个部门，地方上也多设一些，省政府不仅有建设厅，还可以有农业厅、商业厅等等。目前，军事时期大体上成为过去，建设事业成为全国各党派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主要的事。因此需要成立相应的机构，并使之健全和加强起来，以便工作更有成效。

政策问题是全国各地方统一。先掌握政策，进而管理一些事务。大部分事务由地方管，政策由中央决定。毛泽东主席提

出了四面八方政策，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总的方针是这样，但仅有这个还不够，要把这方针贯彻下去，有很多工作要做。最近我到天津去了一次，发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一些会上讲过，今天不妨再讲一下。

在天津时，我和大的厂长、经理接触过，也和工作干部谈过话，后来也召集过几十个人至一百多人的会，发现干部们对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不够；而产业界（也就是资本家）方面也有问题，而且问题还相当多，例如天津的资本家不喜欢人家叫他们“资本家”，对他们的心情，连我在内，都不了解。天津的负责人很少与产业界接触，彼此隔阂不了解。

天津产业界提出了几个问题：

一是对贸易局不放心，怀疑有了贸易局他们是不是还可以做生意。他们认为贸易局和他们抢生意做，既统制了原料，又统制了市场。他们害怕统制。李烛尘先生要到山东临清去销盐，事前问我们好不好？我们的工作同志说：“好”！他就去了，但我们在那里的贸易公司，一看这人是来做生意的，是资本家，于是把盐价一跌，李就亏了本，回来一肚子火。他说，现在的乡村跟以前不同，你们在那里有组织，买卖不好做。所以他下了结论：有贸易公司不能做生意。唐山刚解放，我们贸易公司的同志是懂情况的，他们和启新洋灰厂订了半年合同，和华新纱厂订了八个月合同。起先资本家很高兴，因为刚解放就做开买卖，解决存货滞销问题。但到天津一解放，洋灰、纱都涨价，资本家觉得太吃亏，又不高兴了。一方面是我们没有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一方面是他们担心我们抢他们的生意。

另一个问题是税收。启新厂的洋灰卖给我们，按照合同价是四千元一吨卖的，但市价是一万三，政府去抽税，说市价是一万三，于是照一万三的价格抽税。华新纱厂也是这样，卖价

比市价低，抽税却照市价。他们对税收问题很担心，这一项搞不好，他们的积极性也提不起来。

最要紧的问题是劳资关系。我去天津这一时期，还相当紧张，这是由于工人自发行动的结果，在有我们工作人员的地方还好一些，因为这些人共产党员，懂得劳资两利的政策；没有工作人员的地方就差一些。工人知道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因此闹翻身：要提高工资，失业的工人要上工，在工作上不听指挥。解放前，小厂的工人生活一向很苦，除在厂里吃饭外，工资只合二十多斤米，现在要增加工资，有的竟提高到四五倍。有的已失业好几年的工人也要上工。工厂里工人学马克思主义，讲剩余价值，讲剥削。资本家听不得“剥削者”这三个字，越听越怕。他们摸不着底，对失业工人要求上工以及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心里是不赞成，但嘴上又不敢说。只要是工人代表一到他们那里，他们心里就害怕。工人问资方的意见，他们总是说，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工人提出什么要求，资本家都赞成：不应上工的也上了工，不应加工资的也加了。工人觉得资本家好说话了，工会也觉得资本家好说话了，其实资本家心里并不愿意。这种不抵抗主义，是消极心理，打算反正垮台完事。

除了劳资关系之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李烛尘先生讲，毛主席在《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中谈到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时，只说：一是国家经济；二是合作经济；三是中小资本主义经济。他说，毛主席在这里只提到中小资本家，没有讲大资本家。他觉得自己是大资本家，因此没有他的份儿。有的同志对他说：你不算大，也是中等。他说：今天不大，明天就大。因此，担心他的发展前途。这个问题产业界很关心。另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要在哪天哪年搞？怎样搞？这些问题他们感

到摸不着底，只看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仍觉得对新中国的经济政策摸不着底。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资本家没有生产积极性，不敢做生意。

天津解放后，有二三个月没人去理会产业界，有些做工会工作的同志，不愿意和资本家接触；有些共产党员怕说自己立场不稳，故意避开他们，资本家就更害怕。恰巧，还有上面这些问题，资本家不太放心，尤其是比较大一些的资本家更不放心。有一次，新华社解答公私兼顾的问题，说对私人资本有四种限制，就是：价格政策、税收政策、劳动条件和活动范围的限制，并说不要限制得窒息至死。资本家一看，配合实际情形一想，更觉得不得了，窒息不至死大概也是活不了：税收政策如启新、华新征得过重，价格政策大概就像临清贸易公司压低价格和李烛尘先生抢生意，活动范围也就是这样，劳动条件不外是过高工资等等。他们认为在《天津日报》登载着新华社的这一答复，表明中央的政策是如此。我去时，已经有人准备收场，或者是吃完了算数。他们准备逃走，对隐藏的财产也早就安排好了。例如东亚毛织厂的一部分资金早已逃到香港。要他们把这些隐藏的资金投入生产，不让他们摸到我们的底是不行的。

我去，他们要摸我的底。他们说，你是代表中共中央的。我说：“好！我来就是给你们底的。”共产党员在工作时，先要把底给他，不要等他来摸。他不放心，工厂生产搞不好，工人失业，社会不安定。天津解放二三个月，我们不但没有消除同他们的隔阂，而且隔阂更加深了，不把这点搞通是不行的，是很大的危机。李烛尘先生卖盐的事，我说临清贸易公司的做法不好，要他再去销盐，保证不跌价。整个的原料市场共同分配。有些原料还要进口，如东亚公司希望要澳洲羊毛，而我们

的贸易公司不想进口，如果真不进口，他们的工厂只好不开。原料市场要适当的分配，但由谁来分配？我说资本家分不清，他们老是为分不清而打仗。但是我们可以分配一下，决不至于打仗。天津一家私营纱厂，收购的棉花比贸易公司的还要多，能保证几个月用不完。我说，你们别高兴，以后乡村里组织好，你们一点也收不着。原料还是大家分，彼此都不够，都分一点。至于税收政策及启新、华新两公司合同的事，我说，卖价比市价低却按市价抽税的做法不好，并说你们提出修改意见吧！第二天又让贸易公司的同志主动地找他们解决。目前税收是照国民党税率收的，收得相当好，收入八亿多元，开支只四亿，收入超出开销一倍多。我问他们，过去缴国民党的税不说重，现在为什么说重？他们说，国民党的税可以多缴，也可以少缴，国民党的人员贪污，给他们一些贿赂就可以少缴，你们的同志不贪污，少缴一点也不行。我说，税收可以改，国民党的税不合理，你们提出意见来。不过农民负担很重，要参军、缴公粮、出民伕、还要代耕。城里人只出一些钱，要对得起农民，负担要重一些，但不能重到赔本，赔本就是过重，过重就不行，还是勉为其难。至于工人不守厂规，我说，你们可以重拟一个厂规，叫工人看看，让政府批准，政府批准了，然后按章程办事。现在公司法因为《六法全书》废除也不存在。还有些公司因为有一些官僚资本而害怕又不敢直接了当地说，这些股份也只占百分之十几到三十。因为北平自来水公司有百分之二十的官僚资本被我们接收，而引起他们的害怕。开滦煤矿有交通银行百分之二十的股票，也有些害怕。我说，公司法你们可以草拟一个，我们看一下，在中央政府没有成立以前，先颁布一个临时条例执行。

关于劳资两利问题。我说，有些工厂工资增加太多，这不

行，要与工人商量，把工厂经济公开，说明这样做要亏本，这是要求过高。有些要求是不适当，如要求资本家一定要用多少个工人等等。我要天津也拟一个处理劳资问题的临时办法。资本家感觉这种态度不错，至少是合作的，是照顾他们困难的。后来天津工人开代表大会，我也是这样说的。我说工资过高不行。过高怎么办？降低，而且要自己降，不降不行，否则吃完了怎么办？！我是共产党的人，目前不但不主张给你们增加工资，而且有的还要降，你们一定不高兴。不管你们现在是不是高兴，我的话要说到，不说不够朋友。要不，到那时工厂关门，你们无论是找工会，或者是找人民政府都没有办法。有工人说，工会、政府都不管也不怕，自己可以开合作社。但是这方面我有几十年的经历，可以说不行。从大革命到江西闹土地革命，一直到解放战争在太行山，工人自己搞合作社，结果还不是关门？土改时接收了地主工商业，变为合作社，也还是搞不好，结果还是把机器拆散了，破坏了生产力。所以后来就禁止工人、工会接收工厂，同时也不准厂方把工厂交给工人。总之，高工资不行。为了工人不失业，只好降低工资。工资少吃不饱，但可以吃个半饱，这总比失业好。那天我对工人的讲话，同时向全市广播，资本家都留心听，一听是真的，认为这就是底，有了底就算确实了。

在理论问题上，他们有两个主要问题：

一是剥削者和资本家名称问题。他们问这两个名词能不能改？我说，改也好，但是怎么改？他们想了一阵，还查了希腊字典，也没找出个适当的字。启新厂的周经理比较开明，他承认剥削，但他说由于剥削，一个启新厂发展了一个华新厂，后来又发展了一个大冶水泥厂。照发展生产看来，还应该办第四个厂，但是厂愈多，剥削也愈多，剥削是罪恶，罪恶也愈大，

将来的结果还不是买了个枪毙！总之，他觉得将来没有前途。李烛尘先生不承认剥削，说生产是社会的，主张三三制：员工红利占三分之一，公积金占三分之一，股息占三分之一，或是把股票分给工人。他是想逃避剥削者这个名词。这名词对他们是个大负担。我说，名词改也好，不改也好，改成好听的名词我也赞成，但剥削是客观现实。宋棐卿经理说他们公司没有资本家，东亚公司有一万股，经理是雇用的，所以他也要参加工会。有一次，工人在开会，他这位经理跑去了，工人不好意思拒绝他，工会主席在会上宣布，经理是来宾，并表示欢迎。他一想：自己是经理怎么算是来宾，因此很伤心。他又问，只有几百元的股东算不算资本家？我说，社会生产当然没问题，一切生产是社会性的。只要有了商品经济，连小生产者的生产品也都是社会生产。但问题是占有却属于私人的，如房屋、机器这些生产手段都是私人占有。社会主义是将这些私人占有的生产手段变为社会所有。现在你们占有了房屋、机器，而且生产的商品也归你们所有，不管是赚了多少钱，分红是三分之一也好，还是四分之一也好，剥削是客观存在。不管是有一万股东或者是更多的股东，你是经理，是股东的总代表，对股东负责，有义务也有职责把股息分给股东，你还不是剥削者？问题不是你愿意不愿意剥削，而是那种社会制度决定了你不剥削别人就是被人剥削。你们剥削工人，四大家族^{〔1〕}和帝国主义又剥削你们。所以你们是双重身份。就因为你们反帝反封建，我们才可以和你们联合，所以你们也是革命的朋友。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三个敌人四个朋友，我们把你们放在朋友中，没有放在敌人中。剥削是事实存在，但剥削好不好？周叔弢先生说剥削是罪恶，你们也说有罪。我说既有罪也有功。失业工人请求复工就是希望你们剥削一下，东业公司现在有一千多工人，如有两

千多好不好？好！工人好，社会也好，你们好，共产党也好，不要说两千，有两万多工人更好。周先生打算办第四个厂，如果能办五、六、七、八个厂更好。资本主义剥削在一定条件下有它的进步性，不一定是反动而是进步。你们是进步势力，才是革命的朋友，有功劳，但剥削还是剥削。共产党并不否认资产阶级有它一定的功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就明白地说资产阶级有它历史上的功绩，“资产阶级在它不到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一切过去各代加起来还要更众多更伟大的生产力”。只要有私人资本存在，即使三分之一算作红利还是剥削。我这么一讲，他们觉得也合理。

二是社会主义问题。首先对于限制政策，他们有好些人厌恶。我说，限制有什么不好？贸易自由并不是绝对的，总要有些限制。如李先生要求我们限制临清盐不跌价，贸易公司的盐不跌价，你也要不跌价。又如北平的肥皂太多，要求政府指导，这还不是要限制肥皂厂发展。所以限制是保障生产。“公私兼顾”是限制政策。我们的口号是“先公后私”。双方照顾是相互限制。“劳资两利”是要两利。税收问题，是你们限我们一下，我们也要限你们一下。活动范围现在除投机资本及铁路外，并没有什么限制，连轮船你们也可以搞。现在是自由发展，将来要限制。今天因为肥皂厂太多要限制；假如明天毛织厂太多，是不是也要限制一下？！新华社所讲的对私人资本四项限制的意思也就是如此。毛主席《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文告是一九四七年写的，他在文告中只说到中小资产阶级，但并没有说不准中小资产阶级变大。你们说变大了就不行，这是你们自己加的。

关于社会主义，我们公开声明一定要搞。不走社会主义的路，就要走帝国主义的路，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假如你们找到

第三条更好的路，我们共产党一定拥护你们。走帝国主义的路，你们不赞成，那么你们也要走社会主义的路。中国要工业化，路只有两条：一是帝国主义；一是社会主义。历史证明，很多工业化的国家走上帝国主义的路。如果在没有工业化时候，专门想工业化，而不往以后想，那是很危险的，过去日本和德国就是个例子。现在是没有工业，专门搞工业，将来货物太多就成问题。货物太多也是两条路：一是关门，这条路工人不欢迎，人民不愿意，你们也不愿意；一是抢市场与原料，希特勒还抢不到市场，你们的本事大概比他要差一些。既然不想搞帝国主义，现在就要想办法，现在不想到那时就没有办法了。想黄河不流进渤海，到山东设闸不行，要从青海起就设闸，一开始就给以限制，最后才能使黄河不流入渤海。现在给你们一些限制，最后就可以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这一讲，他们比较了解了。

他们又问我社会主义怎么搞？我说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现在还不可能具体地讲，他们一定要我讲。我说，社会主义是要没收私人工厂的。马克思说这是革命，毛主席说这可以和平达到。要和平达到现在就要设闸，慢慢地去做。可是怎样和平法？很难讲。我给他们打了一个比方：如你们东亚毛织厂宋棐卿经理管得好，比我们进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的生产力高，一个工人的生产力大于一个国家工厂工人的生产力，一个银行职员抵得上我们二三个，如果我们把国家工人生产力提到这么高，不也是进步？！你们技术上行，战术上行，但战略上不行，而我们正相反，这就应该向你们学习。如果经过二十年，一个东亚厂发展成八个，这够你搞的吧！也许二十年后这些厂收归国有，只要你不反对，你宋棐卿先生有本事，还请你当厂长。那时工厂更多，你本事大，八个工厂不够再加八个，

十六个厂你干不干？他说：那为什么不干？我说，干，好！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愿交给你干。他问：我的股东怎么办？这时，他想起股东来了。我说，这些产业有代价地收归国有，股份一年退不完，分十年退。十年还退不完，号召一下，像乡村中有人献地那样，城里也可以号召献股，退一部分，献一部分也可以。十年退不完，十二三四年也都可以。那时情形也不同，工厂多，职业多，不靠股息一样过活，而且资金多，股息也低。即使工厂不收归国有，生产过剩，也得关门，结果也还是交给国家。到那时，这样做才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也许这是一步步地搞，慢慢地分多少年走，反正用不着急，一切都可以迁就，只有“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不能牺牲。你们要摸底，这就是底。那时，大家觉得要收归国有就收，大家觉得要慢一些就慢一些。慢，你们就觉得不痛，不痛就不反对，不反对就对大家有利。有的人心里不愿意，只要口头上不反对，那也没有什么，只要没有反抗的行动就不要紧。对坚决反对而且有反抗行动的人，才送进监牢。所以我说今天扩大剥削范围于人民有功。

以上所谈的是两个原则问题，其他还有一些问题，如加入工会问题，资本家是不能加入的，工人开会，经理来了当作来宾，这很客气，很好。有人说工人讲话不好听。我说，你们是有身份的，今天工人也有身份，大家都有身份才好。过去你们骂工人，今天工人骂你们，当然这也不太好，我们也不赞成。但是你们自高自大，这也不行，要放下架子，不要轻视体力劳动，要讲平等，这点连美国式的民主也赞成。

关于劳资问题，我在职工会上就是这样说的：今天资方是朋友，要联合他们。但下面还有一句是：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他们害怕这句话。我就是这样讲的。我对他们说，劳资是

有矛盾的，这个矛盾不能调和，只能缓和。工人对你们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你们也一样向工人进行适当的斗争，这样才能“劳资两利”。斗争是“必要的”而且是“适当的”，过火就不行。工人代表来，你们向他们说：“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个态度就不对，答应就答应，不答应就是不答应。而且斗争都是你们先开始斗的。宋斐卿的工厂里有一个女工，劳动很强，宋非常喜欢她。一次，这女工病了，送到医院里去，检查结果是肺结核，厂里打算赶她走。女工写了篇文章在报上登出来，工厂里就不敢赶她。我说，这是斗争，是你向她斗争，她也向你斗争。这种有病的工人一二个厂里还可以养得住，如果有几十个人怎么办？但工人被赶也没法生活，不行。这是生死斗争。如果你们还像上面讲的那样对工人说：“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将来工厂搞垮了，共产党不负责任。但斗争是要合法地进行，打、骂等不行。有一个厂工人要求在“五一”节每人发一身新衣服，厂方不敢拒绝，也不想发，就去问工会。总工会说：不要发，你发了，别的厂也要求发怎么办？总工会给他撑了腰。结果厂方对工人说：“我们本来想发，总工会不叫我们发。”这是狡猾的斗争，是不合法的。以后国家设劳动局，缓和一些斗争。

这么一讲，资本家由消极变为积极，隐藏的资金也拿出来了。天津国家工厂员工有七八万个，私营的还超过八万，私人企业不积极起来不行。一旦他们动起来，国家工厂一定有许多办他们不赢。天津大小工商业有四万家，这些私人企业在生产方面是无政府状态的，有它的破坏性，但不积极更不得了。资本家原来不放心共产党，但我们把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推翻的时候，他们是又惊又喜。我说，共产党没有做别的事，只是把大门的钥匙拿在手里，现在门打开了，你们好办工厂。现

在有些事资本家还摸不清。例如东亚公司就有北伐以前湖北督军王镇平的资本，他们还怕我们大搞。但我说，只要有利于国民生计的就不没收，你办总比我办好吧！

如果能解决困难，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把前途说清楚，资方就安定，而他们生产一积极，工人也安定，这是走向社会建设必要的条件。现在财政经济问题是个重要的问题，不弄好不行。一个天津有几万家工商业，连员工家属就有好几十万人，这许多人不安定，社会也没法安定，一个天津弄不好，整个中国也没办法。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刊印。

注 释

〔1〕即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四大官僚买办家族。

中共中央关于使人民币在新解放区 占领阵地给华东局等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

华东局、上海市委、南京市委并告谭政、陶铸、华中局、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

(一) 华东财委六月四日电及上海市委六月五日电均悉。上海市场收兑金圆券仅用人民币四亿元即已兑完。上海市场上流通的主要通货不是金圆券而是银元，此种情况乃是在平津解放及我军渡江后金圆券迅速崩溃，南京政府完全垮台之下造成的。又据谭政、陶铸二日电武汉银元亦甚猖獗。这样在我们新解放区的金融上面就发生了新的情况：

(甲) 金圆券不打自倒，因此在金融上我们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

(乙) 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人民币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都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平津）。过江以后，情形就不同了，我们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而城乡均是银元市场，乡村非但不能帮助城市推行我币，而且增加了我币推行的困难。

* 这个指示是陈云起草的。

上述两点所产生的结果是：沪汉两地银元占领着市场，人民币不易挤进去。估计将来解放长沙、广州等城市时，亦会有相同情况。因此，中央同意上海市委五日电意见及华东财委四日电所提出的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六项办法^{〔1〕}。（另电转发各地）

（二）但这一斗争不是容易的，比对金圆券斗争困难得多，斗争可能延长得很久，这是我们必须认识的。因此，除政治手段外，还须陆续采取许多经济步骤。我们除同意上海市委及华东财委所提的六项办法外，尚有下列各点，请加研究，并提出意见：

（甲）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及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

（乙）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另外请考虑是否可预征若干种税款。

（丙）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但应避免向工厂、商店普遍摊派公债。

（丁）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查验资金。

（戊）开放各解放区之间的汇兑，其目的是以老区比较坚强之货币阵地来支持南方新区货币阵地。通汇之后，原来物价较低的老区可能因此物价上涨。但如果沪汉地区我币不能占领市场，在大军南进、发行更多的情况下，沪汉及南方高涨之物价会促起老区更猛烈的物价上涨。此点亦请华中、西北、东北加以考虑，提出意见。

中 央

六月八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出版的
《陈云文集》第一卷刊印。

注 释

〔1〕华东财委提出的六项办法是：一、在报纸、座谈会及群众会上公布我们对银元的态度，进行思想动员，警告投机者。二、集中三千五百万银元，乘高价在黑市抛出，两三天内逐渐压低银元价格。三、京、沪、杭、芜各大中小城市市面禁止银元流通。四、禁令公布后，群众、军警立即全面出动，镇压银元贩子，对银元大投机家，择一给以严厉的处分。五、银元举行折实存款，并收兑银元。六、贸易处抛售各种实物（油盐、粮煤和工业品）吸收人民币，但又适当收购工业品，使物价不致过分下跌，仍能稳步上升。